



САН 2/7

出版者說明

威廉·李卜克內西(1826—1900年)是德國民主運動和工人運動著名的活動家，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創始人和領袖之一。他積極參加了德國1848—1849年革命，革命失敗後，先後僑居瑞士和倫敦。在倫敦，他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響下成為社會主義者。

李卜克內西曾加入倍倍爾組織的薩克遜工人協會，並和倍倍爾一起領導了反對拉薩爾派的鬥爭。1869年，他和倍倍爾主持了愛森納赫工人組織代表大會，會上建立了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從此他是黨中央委員會委員。

1867—1878年間，李卜克內西先後當選為北德國會議員和全德國會中的社會民主黨議員。他善於利用議會讲坛揭露普魯士容克的反動政策，以戰鬥性的熱情洋溢的演說進行革命鼓動。他堅持黨在國會中的策略、立場，對敵人決不作原則性妥協。

李卜克內西在革命活動中也犯有嚴重錯誤。1875年在哥達代表大會上，他為了達到德國無產階級的統一，熱情地促成了愛森納赫派和拉薩爾派的聯合。但是，他在革命理論根本原則問題上向拉薩爾派作了讓步，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嚴厲批評。此後，他在俾斯麥實施反社會主義特別法初期和在擔任黨中央機關報“前進報”編輯時，都曾犯過錯誤。不過，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批評的影響下，他在鬥爭的關鍵時機終能採取革命立場。

李卜克內西的著述很多，其中特別是他的關於闡述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策略基礎的著作，是很有價值的，現在譯出的本書的前

两篇，就是属于这类著作的一部分。

本书第一篇“論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立場，特别是对国会的政治立場”，是李卜克内西于1869年5月31日在柏林工人联盟會議上的演說。

李卜克内西在演說中，論述了社会主义和民主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实质，明确指出“在軍事警察和大兵的刺刀所統治的情况下”，“普遍选举法只能是专制制度手中的玩物和工具”（本书第15頁）。因此他认为，俾斯麦頒布普遍选举法，“根本不是为了使它成为民主的杠杆，而是为了使它成为反动派手中的武器”（本书第16頁）。

李卜克内西考虑到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強調指出，工人阶级除了社会斗争以外，还必须进行政治斗争。他对于俾斯麦和反动派所宣揚的“社会主义”的欺騙性，則給以彻底揭穿。

李卜克内西发表这篇演說时，德国的民族统一运动正在两条道路上进行着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尽管在前两年北德联盟已經成立，德国已按照反动的俾斯麦政策有了重大转变，而李卜克内西对于革命的远大前程依然满怀信心，他說，“未来将属于以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民主”（本书第21頁）。

本书第二篇“不要任何妥协，不要任何选举協議！”，是李卜克内西在逝世前一年即1899年鉴于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领导和当地中派組織訂立正式協議的危險活动而写的。

李卜克内西的这一著作，对于当时过高估价議会活动作用的机会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抨击。列宁在1906年同孟什維克进行激烈斗争时，曾为李卜克内西这一著作的俄譯本写了序言^①，給了它以非常高的评价。

^① “列宁全集”第11卷，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86—392頁。

李卜克内西从党的策略基础建立于阶级斗争这一根本原则出发，强调指出，阶级斗争是党生存的条件。任何用订立协定、选举协议、妥协等等的所谓“现实”政策来代替党的阶级斗争政策的企图，都是错误的。他说：“我们仍然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还是放弃使我们不同于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斗争观点，……关系到我们是否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党，还是我们转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左翼”（本书第59页）。

李卜克内西在议会活动中所采取的不调和立场，并不排斥原则上有利于革命的必要的协议，问题在于在什么情况下允许订立协议和订立怎样的协议。他指出，社会民主党人必须严肃认真地考虑到达成协议和妥协的暂时利益有否损害工人阶级政党的长远利益。并告诫人们，必须认识订立协议的“同盟者”是怎样的人，是不是隐蔽的敌人？他认为，公开的敌人是容易被打倒的，“但是对那些自称是我们的朋友和兄弟，向我们伸出手来订立选举协议和骗取我们信任的敌人”（本书第58页），才是特别危险的。

李卜克内西极力坚持民主的和无产阶级的道路，决不向反动统治制度、容克俾斯麦政策作任何让步，这种革命斗争精神，充分贯彻在他的著作中。他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原则当做交易品”，“我们应当推翻统治制度，同它进行殊死战”（本书第74页）。

本书第三篇“蜘蛛和苍蝇”，是一篇深入浅出的通俗读物，作者以生动的文笔，寓意深长的比喻，尖锐地刻划了罪恶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对于传播革命思想激励斗争意志有很大作用。

李卜克内西的著作也还是有缺陷的，他在本书中对于拉萨尔的评价是不正确的，而且他不止一次地把拉萨尔的名字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并列在一起同称为“伟大的导师”，也是错误的。在书中的个别地方，如说“社会民主党……所力求取得并为之而奋斗

的政权，其目的不是获得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消灭资产阶级专政”（本书第53页）这样的论点，是不够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进行阶级专政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1964年5月

新
子
知
舟

PDG



统一书号：3002·114

定 价： 0.38 元

目 录

論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立場, 特别是对国会的政治立場	1
1889年倫敦版序言	1
第二版序言	5
悲喜剧式的結尾	24
跋	31
不要任何妥协, 不要任何选举協議!	33
蜘蛛和蒼蝇	83
注釋	88

資源
分享
知識

PDG

論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立場， 特别是对国会的政治立場

1889年倫敦版序言

我現在出版的这篇演說，沒有作任何修改，某些无可救药的头脑简单的人，习惯于引用我这篇演說，以证明现在的我已不是十年前的我了。我乐于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过錯，而且要补充一句，我确实是个“識时勢”的人，因为我总使自己的行为适应于变化着的情勢。我甚至有这样一种荒唐观点，认为一个人不随着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其行动方式，是并不怎么聰明的。在业已改变的情勢中不改变策略，这并不证明性格的坚强，只证明智力的貧乏，并不证明始終如一，只证明无能为力。在战斗过程中不能改变策略计划的將軍，是不中用的；最輝煌的胜利，是由于在战斗时修改策略而取得的。

我今天的目的，同二十年、四十年甚至更多年以前一样，不过現在更明确一些并且范围广泛得多。我不止一次地改变过我的策略，非常可能我会再一次甚至多次改变我的策略。在活动范围和战斗基地改变的时候，我絕對会改变我的策略。

首先，我要指出我发表这篇演說的日期。它是在1869年，显然是在普法战争以前，德帝国建立以前。

那时的“北德联盟”¹具有某种暂时性的迹象，正如古怪的南德諸国一样。沒有一个人（連俾斯麦²也不例外）知道，这个“联

盟”是否是个早产儿、畸形儿、还是个正常的新产儿。因为一切都取决于国外列强的恩赐，依靠了列强或多或少在道义上的支持，才实现了这一“爱国主义的”事业。我在1848年和1849年为了德国的自由和德国的统一，反对这一“民族的”怪物的创造者而进行过战斗，我一落到这些创造者的手里，他们就会二话不说把我干掉。我难道能丢棄自己过去的一切，贪图普选权这块油脂，而让自己落入扩大了普鲁士军事警察国家这个捕鼠籠中嗎？当然不能。如果条件不改变，我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估计，会和我对目前政治形势的估计一样。

但是，爆发了对法战争。靠俄法的恩赐而生存的北德联盟，改組成“德帝国”。

这就造成了完全新的形势。

德帝国决不符合“民族理想”。它既沒有实现“统一”，也沒有实现“自由”。这不过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德国，这是一个兵营的德国，周圍还有一个大监狱。

然而，德帝国到底过着独立的生活，不依賴外国的恩赐，不能用一次打击，一次机械式的推动，就能从内部或者外部把它推翻。只有通过机体的内部发展，才能从周圍还有一个大监狱的这大兵营中，产生出一个自由的国家。

簡短地說，这个残缺不全的德国(Rumpf-Deutschland)包含着一些因素，这些因素能够逐渐长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统一的德国，会在某个时候在欧洲合众国和全世界占据一个应有的席位，会使人忘記今天我們祖国在文明世界諸国中所扮演的可悲角色。

根据我的爱好和願望，我决不会到国会里去。每当“无政府主义的”吹牛大王們称我是个癖好国会制度的人的时候，我总忍不住要笑出来。我本人和国会制度的关系很不好。我对演說和发表演說总有点蔑視，我生来絕不是为了进行国会活动的。国会活动完

全不适合我的天性。我发表演说永远是勉强的，并且只有在我的崇高职责号召我发表演说的时候才这样做。没有一个人对我的国会活动的意义的估价，比我自己的估计更低。

然而，在目前条件下国会活动给我们党的这种巨大好处，只有瞎子才看不出来！如果社会民主党在德国比在任何别国组织得更好，具有更大的力量，那末我们首先应当归功于我们的国会活动以及由它决定的、同它不可分割的参加选举斗争。

在我的同志们的一致同意下，我把参加选举斗争提到首位。普遍选举法的教育作用如此明显，我认为没有必要来解释它的意义。如果我们决定不采取参加选举的政策，那我们今天还会是一个小派别，而不会是一个党。在这个党的周围集中了我们全部政治生活，尽管所有的政党，包括政府在内，都对我们进行了公开的斗争。

我们参加选举和国会活动，主要是追求宣传的目的，这一点我的同志和我经常强调指出过，我没有必要作更详细的叙述。现在我们还是很少的少数，其他一切政党在国会中作为“反动力量”反对我们，反对任何重大的工人立法，反对任何实行社会改革的重大步骤。在此以前，事情不会有所改变，我们的国会活动将和从前一样服从于一个任务：影响群众，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现在，关于国会活动我再谈几句话，只说两三句话。好的演说家通常总是坏的政治家。演说家常常使自己和听众陶醉。演说家的成功和演员的成功有共同的地方，它发展虚荣心，产生几乎永远是可笑的、往往也是危险的夸大狂。

当然，不能完全拒绝代表机关的原则，但是应该对它作最必要的限制，也就是要竭力使立法工作和管理工作不是由国会而是由委员会来进行。每一个熟悉国会生活的人都知道，国会中的辩论很像剧院的演出，不像对现存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现在，国会的主要工作必须在委员会中进行。

人民为了一定的目的而选举出来的一些委员会，只是为了討論同它們都有關的問題才能集合在一起；這些委员会在法律生效以前，提出全部法律草案給人民表決，使人民不僅有權否決提供給他們的法律，而且有立法倡議權；同時也有不受限制的出版、集會的自由，而這一切都存在於一個沒有任何力量來反對人民的政府之下。我大概想像的將來的（那時某種政權形式一般還將保持）立法和政權形式就是如此。在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有很大一部分現在已經是簡單的管理機關，而當資產階級（它以鎮壓勞動民眾的政權授於國家或政府）的階級統治一旦被摧毀的時候，政府會成為純粹的管理機關。

但這暫時還是“未來的音樂”。幾年以前我在柏林的一次講演中，為現在擬定了這樣一個自己的國會（確切些說是非國會）綱領：

盡量限制演說部分；只在黨的利益需要時才發表演說；如果沒有這樣的利益，如果事情不涉及施行有利於工人的法令，沒有必要痛斥敵人，全面評述統治制度，換句話說，如果發言沒有完成宣傳任務的目的，那末，保持沉默勝過任何演說；饒舌和空談會摧毀黨的事業，因為它們能夠使黨喪失行動的意志。

在全体會議以外，在委員會里（如果我們又能參加進去的話），國會活動同樣應作最必要的限制。但只不過是限制。放棄使我們能參加委員會討論的武器，正像使自己不參加全体會議的立法工作一樣是很愚蠢的。我們的選舉人，完全有權要求我們在國會中盡一切努力，來改善勞動群眾的狀況和社會民主黨的業績。我們一味否定和抗議的策略，會成為疏遠我們朋友，摧毀我們腳下基地的必然手段。在這裡，正像在一切實際政策中一樣，我們應該遵循簡單的功利觀點，當然，是在不破壞原則的情況下。

李卜克內西

1888年11月15日羅爾斯倫甫

第二版序言

不久以前，在开审莱比錫“譴責叛國案”³的陪審法庭上，我不得不就下面的報告作了講話，这个講話使我现在可以不再作进一步的說明。对于上述講話，我只能作很少的补充。我三年以前所做的報告，是一篇“即兴演說”，因而也正要作为这样的演說來估計。对我当时所說的某些話，我既沒有理由收回，也沒有理由減輕。我最沒有理由減輕的，是我对俾斯麥國會制度的某些批評。这个國會制度在“德國國會”中所作的“光榮”表現，不亞于它在“北德國會”仙逝時的情況。

但是，我对这一特殊的累贅物的尖銳品評，当然應該扩大到一般國會制度。因为國會制度誠然無論在什么地方（包括波拿巴的Bas-Empire^①在內），都沒有像在普魯士德國扮演这样可怜的角色，可是在一切有國會的国家里，它总是为欺騙和奴役人民服务，無論在什么地方它不过是用詞藻的金綫織成的一件戏裝，专制制度和階級統治在这件戏裝后面隱藏着它們的丑惡本质和謀殺工具。在人民管理的地方，在瑞士和美国（它們当然还不是社会民主党所要求的那种典范共和国），就沒有任何國會制度。我們所追求的直接人民立法和管理，誠然不能完全沒有代表机关。但是，通过自由的人民选举推派出来的公民，会組成委员会，实事求是地完成規定的、严格限制的任务，而不会組成清談俱乐部，在那里談話多，能力弱，簡直不可能認真考察問題，严肃进行討論，通过勇敢的成熟的決議。不是法国的議會，而是它的委员会完成了英勇革命的巨大工作，清除了封建世界的骯髒馬廐⁴。就連我国的國會制度，

① 最后帝国（法文），人們这样称呼衰亡时的羅馬帝国。在19世紀的文献中，这一术语用来代表法国第二帝国。

也看到自己必須把真正的实际工作交給委员会去办。

但是关于这一点，下一次再作更詳細的叙述。

我在报告中还提到了施韦澤的活动和普魯士王国宫廷社会主义之間的不同，这在当时的党派关系中是有其根据的。我和倍倍尔在全德工人联合会⁵ 巴門—爱北斐特全会(1869年8月)上的演說，表明我們同封·施韦澤先生⁶ 訂立了类似停战协定的东西，这在当时还有效，但很快停战状态就中止了。全德工人联合会(順便說一下，不管封·施韦澤先生过去对这个联合会产生过多大影响，——遺憾的是，今天他还以間接办法对它保持着这种影响——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联合会同目前幸福地获得宫廷詩人称号的封·施韦澤先生等量齐观)当时的政治立場，最后在我的报告中完全正确地把它称为“民族自由主义的”立場。

我这样大力強調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間不可分割的联系，那是施韦澤的策略迫使我这样做的，这个策略要使工人不相信民主。至于对“市民民主党”(我保卫它，反对宫廷社会主义的卑鄙攻击)所作的各种不正确解釋，則随着雅科比⁷ 的加入社会民主工党而失去了任何基础，因为我指的正是雅科比及其同志。

在这些說明以后，下面就是我的报告，它是根据1869年夏載于“民主周刊”⁸ 上的原文(不是速記记录)翻印的。該报告以后出了单行本。

威·李卜克內西



这次我没有听到国会里的言论，所以我更高兴利用这个机会谈谈我的社会政治观点。

对于社会民主党在政治斗争中应该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如果我们弄清了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的话，就可以容易而自信地予以回答。社会主义和民主不是一个东西，但它们不过是一个基本思想的不同表现，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从来不可能互相矛盾。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臆想的社会主义，正如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虚假的民主一样。民主的国家，是按社会主义原则组成的社会的唯一可能形式。

所有反对资产阶级的人，都同意社会主义的否定方面。瓦格纳⁹、凯特莱尔主教¹⁰、奥国国会的天主教教皇和普鲁士典范国家的新教地主，他们都像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一样，使用同样的口号，高声谴责资产阶级。这表明，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本身，不仅不是人民的民主斗争，而且能够受到最反动的动机的束缚。所以，除社会主义的否定方面以外，必须同时提出社会主义的肯定方面，使我们同这些反动分子区别开来。首先我们要说：除社会斗争以外，我们也进行政治斗争，而且应该把这个斗争放在最前列。正因为我们弄清了社会主义同民主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才称自己为社会民主党人。这个称呼，这个名称，包含着我们的纲领。纲领的存在，不是为了在字面上承认它，而在事实上否定它。纲领应该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导线索。

如果我们只局限于社会斗争，而不给政治斗争以相应的地位，

那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危险：我们的敌人会利用现存阶级矛盾，根据 divide et impera(分而治之)的法则，时而和资产阶级勾结起来反对工人，时而奉承工人，利用他们来反对资产阶级。这种两面派手法是现代皇帝专制的特色，它主要依靠利用阶级矛盾。在法国，帝国今天从工人手里“挽救”资产阶级社会，明天向工人献媚，以便把吓慌了的资产阶级赶入他的捕兽网中。这里，在普鲁士，皇帝专制也在这方面复制法国的版本，有时友好地拍拍资产阶级的肩膀，有时友好地拍拍工人的肩膀。请看，事情竟到了这种地步，民族自由主义，即组成了政党的资产阶级，把普鲁士政府看成是它反对工人的教星，而被愚弄的工人(我们希望，尽管从上面不断进行腐化尝试，这样的人还是不多)，却等待着这同一个政府来保卫自己反对资产阶级。

要使社会运动不利于皇帝专制，社会主义必须战斗在最前列，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先进战士。

应该首先明白，社会运动是一个革命的改造过程，不是在一两天内就能完成的。社会问题像传说中那种植物一样，它的花在蓓蕾状态中瞌睡了整个世纪，突然拍刺一声冒了出来。“革命”这个词有双重意义。第一，把它简单地理解成推翻这个或那个政府——这可能是短期巷战的结果。这是这个词的较狭义的意思。比较广义的意思，包括新社会机体的整个发展过程，这个机体必须为自己创造相应的国家形式。这个在和平时期也不停止发展的革命过程，可能加快，但不能靠某个奇效的丹方，任意把期限缩短到最低限度。

资产阶级花了五百年的时间，才得到今天的统治地位。无产阶级的任务，是要取消建立在雇佣劳动上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把阶级统治同雇佣奴役一起加以消灭。这个任务无产阶级不能在几年内完成。现代无产阶级革命，当然不会要从前资产阶级革命那

样长的期限，在蒸气和电报的时代，人类更快地前进，文化普及于更广泛的群众，为新思想进行斗争的人们，有更大的可能用新兵加强自己的队伍。

但是，新社会和旧国家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它不可能在一个封建、警察和黷武的国家里得到发展。因此，谁希望实现新的社会制度，谁就应该首先帮助消灭旧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在纯粹社会问题上，社会民主党在现存条件下不得不主要站在理论的基地上。社会民主党必须预先获得国家，才有可能转向社会实践。

这决定了社会民主党在“改造德国”方面的立场。1866年的“伟大事件”对德国的意义，正同1851年12月2日的国家政变对法国的意义一样。俾斯麦的国家政变，和拿破仑的国家政变一样，旨在反对民主。我们谴责这些行动，不是由于它们带有强力性质（因为强力不仅是帝王的最后决策，而且也是人民的最后决策），而是由于这些行动的实现，在法国有利于一小撮卑鄙的冒险家，在德国有利于一个再也没有权利生存的阶级——容克。

所谓“普鲁士立宪冲突”¹¹，是人民，首先是资产阶级用国会手段夺取国家政权的尝试。1866年把国会斗争降低到杂技比赛的水平，而真正的军事行动的舞台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不管有什么普遍选举法，但北德“国会”绝对没有一点权利。它没有表决权，只有发言权，由于自己的无力，它不可能被民主派用来作为争取政权的舞台。

德国民主派对待北德联盟以及与其有关的一切，正如法国民众派对待专制帝国一样，必须采取否定的、敌对的立场。它如果不采取这种敌对立场，不仅一定会背弃自己的原则，从而背弃自己，而且一定会破坏实践智慧的最普通规则。

现在我谈一谈民主派一般是否应当选进“国会”的问题。选举或不选举，在有普遍选举法的条件下，不是原则问题，而是一个利

害問題。我們有選舉的權利。這一權利是御賜的，這種情況沒有使我們喪失我們的自然權利。如果我們看到這對自己有某種好處，我們就選舉。在召開“國會”時，我們用這種觀點考察了薩克森的問題。部分同志從利害觀點出發反對參加選舉，另一部分同志贊成參加選舉。必須放棄選舉的根據是，這種策略可以更清楚地向人民表明他們的無權地位。必須參加選舉的根據是，在民主派放棄選舉的情況下，敵人會單獨占有讲坛，單獨利用言論，從而能夠更容易地進行欺騙，給人民造成錯覺。後一種看法占了上風，因而通過了一項贊成參加選舉的決議。我個人堅持下面一個意見，我們選出的代表應當帶着抗議書進入“國會”，然後立刻離開“國會”，但不放棄自己的代表權。我這個意見處於少數地位。通過了一項決議，說民主派的代表可以利用一切他們認為適當的理由，在“國會”中表明自己對“國會”所持的否定態度並提出自己的抗議，但是他們必須拒絕參加國會本身的工作，因為參加國會工作可能被解釋為承認北德聯盟和俾斯麥的政策，而使人民看不清這一事實，即“國會”中的鬥爭僅僅是偽裝的鬥爭，僅僅是偽裝的行為。在“國會”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會議上，我們堅持了這一策略。在討論作為這次會議主要題目的手工業章程時，我黨的一些同志認為，為了工人的利益和宣傳目的，這次應該作為例外。我反對這種看法。社會民主黨在任何條件下和在任何方面，都不應當與敵人進行談判。只有在具有共同基礎的地方才能進行協商。與原則上的敵人進行協商，就意味着犧牲自己的原則。原則是不可分割的，它們或者是全部保持住，或者是全部犧牲。哪怕最小的原則上的讓步都是放棄原則。誰和敵人進行國會談判，誰就會同他們商定某個問題；誰達到協議，誰就是妥協。

在這方面，進步黨¹²可能是我們頗有教益和值得警惕的先例。在所謂普魯士立憲沖突時期，這個黨大作漂亮的和有力的演

說。他們以多么大的力量抗議（口頭上）改組啊！他們多么“自信地”和“天才地”保衛（口頭上）人民的權利！但是法律論據是不大能驚動政府的。政府容許進步黨随心所欲地議論權利，而它本身依然如故並且實施暴力。進步黨呢？它不放棄在這種情況下已成為最有害的荒誕行為的議會鬥爭，它不離開讲坛，從而迫使政府實行露骨的專制制度；它不向人民呼喚，却陶醉在自己的空話里，繼續孜孜不倦地奢談抗議，作法律上的說明，並且通過一些決議，這些決議大家知道對政府不起任何作用。眾議院因而從政治場所變成了滑稽劇院。人民總是聽到些陳詞濫調，看到些毫無結果的事情，於是就不再理睬議會鬥爭，起初對議會鬥爭漠不關心，後來對它滿懷鄙視。這就使1866年的事情有了可能。普魯士進步黨的“漂亮的”、“有力的”反對派的演說，為鐵血政策¹³建立了基礎。這些演說成了進步黨自己墳墓前的悼詞。確切些說，進步黨被自己的演說送進了棺材。

我應當在這裡提醒這樣一點，並首先想使建立了聯盟的在座的各位成員重新回憶起這樣一點：拉薩爾¹⁴堅決地譴責了進步黨的行動方式，並且預言了這種策略的後果。他勸告代表們離開國會的讲台，辭去自己的代表職權。但是很遺憾，他沒有想到拒絕納稅的要求，而這在當時是迫使政府讓步的唯一有效方法。但是，無論如何拉薩爾是正確的，他指出了國會空談、為演說而演說的荒唐和害處。

如果現在民主黨犯了進步黨六年前所犯的錯誤，那是因為同樣的原因會導致同樣的後果。

但是不管真正的政治觀點怎樣，應該說，我們黨參加國會辯論，不能帶來一點兒實際好處。

可以預見，在目前的“國會”成員中，談不到實行我們認為原則上重要的立法方案。

有些人反駁說：“但是，在国会中我們有最有利的机会，在听众面前發揮社会民主党的原則。”这种机会我們是有的，但无疑不是最有利的，甚至簡直是不利的。

难道你們认为，“国会”容許別人把它的讲坛用作講座嗎？假定馬克思要給代表們宣讀一系列的理論報告，人們会长久地多次地听下去嗎？可能出于好奇心听他一次，但再多就不会听了。

我已經說过，关于我們对立法发生影响的可能性，是用不着加以考虑的。在这种情况下，在“国会”叙述我們的原則能追求到什么目的呢？也許能使“国会”議員轉向社会主义？！考虑这样的可能性，簡直比儿戏还不如。这实在是愚蠢。

向“国会”議員宣傳我們的原則，比起向海浪大喊我們的原則，沒有更大的实际意义，差別仅在于后者不那么可笑。布拉恩¹⁵先生們及共同伙清楚地知道，我們希望什么。对于他們，正像对于在“国会”中几乎是唯一代表的統治階級，社会主义已經不是理論問題，而簡直是力量問題，这个力量問題在任何議會中都不能解決，它像任何其他的力量問題一样，只能在大街上，在戰場上解決。

“关于对‘国会’本身的影响，我們也是不考虑的；我們只想利用‘国会’的讲台，以便通过它对人民講話。”

好得很。我当时也在这个意义上利用了国会的讲台，现在又重新这样利用它。但是，难道这个讲台是适于发表理論演說的地方嗎？在“国会”中禁止宣讀事先写好的讲稿。你們都会同意我这样一个看法，就是最有經驗的演說家甚至在人們安靜地听他演說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在“国会”中是从來沒有过的），也不能靠記憶来叙述他的科学著作，也不能把科学著作像他在家里写字台上准备好的那样，原原本本口授給速記員。

“但是在‘国会’中，他可以說出一些在其他場合被禁止公开发表的观点。”

我否认这一点。我可以在“国会”中攻击现存政治制度，这在普鲁士任何其他会议中不会不受到处罚，但是在社会问题上，即在理论方面，什么意见都可以在其他地方不受处罚地发表出来。难道我们应当这样害怕反法律的斗争吗？事实是，普鲁士每天自由刊载和口头发表的有关社会问题的言论，比国会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演说的全部内容要革命得多。

我们假定，我们能够用走私的方法把某个在别处不能发表的真理偷运进“国会”。我们又能得到什么东西呢？法律诚然允许自由转载国会演说，但是如果报刊只登载演说摘要或一个演说而没有发表全部争论，这个法律就要报刊对每一个字负责。要刊载全部争论的速记报告（因为法律只允许用速记报告），甚至连大报也没有足够的篇幅，更不用说社会民主党的小报了。

要将巧妙地运进“国会”的真理，重新从那里运出来交给人民，除了通过官方的速记报告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但速记报告由于它巨大的篇幅和昂贵的价格很难传达给群众。

工人能够从争论中知道的有关社会问题的东西，他们可以从工人报纸上知道，而工人报纸所援引的国会会议报告形式的东西，它们能够更好地经过更详细的修改以独立的社论和论文的形式登载出来。

我们还要指出，运用关于“走私偷运”的实际论据的人，最少出卖警察禁止的不合法货物。例如就拿封·施韦泽先生的“大演说”¹⁶来说，其中每一个字都完全能够通过三月革命以前的书报检查。

概括说来就是：

我们的演说不能直接影响立法。

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演说使“国会”走上正确的道路。

我们不能靠“国会”中的演说把任何真理告诉群众，如果这些

真理不能以其他方法更好地加以傳播的話。

在“国会”中发表演說有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根本沒有。沒有目的地說話，这是傻子們的消遣。

可見，我們參加“国会”得不到任何好处。而且还有坏处：我們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原則，把严肃的政治斗争降低到国会体育比賽的水平，这就是把人民引入迷途，使他們产生幻想，以为俾斯麥的“国会”要解决社会問題。在这一切以后，我們能否“从实际見解”走向某种国会談判，走向某种国会妥协呢？只有背叛和近視才能要求我們这样做。

从原則观点看是正确的东西，在實踐中永远是最好的。忠实于原則，这是最好的政策。

我不是想以此來說明，国会斗争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条件下都应该加以否定。在长期萎靡不振的年代，当政治軀体上的血液循环衰頹和弛緩的时候，当被压抑的人民情緒看不见几十年后的出路的时候，在某个国会中举起哪怕是微弱的自由之火，照亮周圍的黑夜，可能也是有好处的。

或者当人民，当准备投入战斗的“工人連队”站在国会門口的時候，从讲台上发出来的語言，也許能成为电的閃光，能成为建立解放功勛的信号。

現在，謝天謝地，我們已經不是生活在經常停滯的时代，但遺憾的是，我們还并不处在有決定意义的人民发动的前夜，那时行动的能力和意志将像泉水一样，从人民深处噴射出来。

我根本不是对生动語言的意义估計不足。然而在危机时代，在一个世界正在死亡另一个世界正处在产生过程中的时代，人民的代表应该生活在人民中間。至于說到我，那我认为在直爽和誠实的工人的會議上說話，比在一批地主、变节分子和毫无知識的人（这一批人在蔑視权利和人类的政客的指揮下集合起来，并自称为

北德“国会”)面前說話,不仅更有价值,更加光荣,而且更有效果。

但国会是普遍选举法的产儿。普遍投票是人民的意志,而我們作为民主党人必須尊重人民的意志,因此也必須尊重“国会”。

在这个經常引用的和流行的論断中,我們时常遇到对普遍选举法的不恰当的过高评价,这一过高评价主要依靠拉薩尔的威信,达到真正偶像崇拜的地步。特別在北德,很多人把普遍选举法看作有奇效的丹方,它为“不幸的人”开辟了取得政权的通道,他們用幻想来自我安慰,认为他們依靠普遍选举法能够在一个軍事警察国家里,像从前閔豪森^①一样,从社会貧穷的泥潭中把自己拯救出来。这些人应该用閔豪森的辮子来裝飾自己的脑袋。当然,普遍选举法是人民的神圣权利,是民主国家、社会民主国家的基本条件。但是,在孤立的沒有公民自由的情况下,在沒有出版自由結社自由的情况下,在軍事警察和大兵的刺刀所統治的情况下,一句话,在一个专制制度的国家,普遍选举法只能是专制制度手中的玩物和工具。

波拿巴奸險地扼杀共和国以后,宣布了普遍选举法。

俾斯麦伯爵为容克的本位主义取得胜利以后,由于1866年的“成就”而清算了自由資产阶级并毀灭了德国以后,他做了16年前他的前辈做过的事情,頒布了普遍选举法。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这种来自上面的普遍选举法的頒布和恩賜,巩固了专制主义的胜利。这一件事情,就应该使天眞地醉心于普遍选举法的人睜开眼睛。

这里不是解釋波拿巴的动机的地方,至于說到俾斯麦公爵所抱的动机,那是像白天一样清楚的。

三級选举制¹⁷ 不管它的全部不民主性和反民主性如何,仍然

^① 閔豪森是德国作家华尔格爾(Bürger, Gottfried August)在1876年写的一部流傳很广的民間故事书“閔豪森的旅行和冒險”中的主人公。閔豪森男爵是个吹牛說假、妄自尊大的人物,著者用这个典型人物来嘲諷和揭露当时的封建貴族。——譯者注

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因为国会代表权的重心轉向了有产階級，这些階級虽然經常准备同专制制度結成反工人反民主的統一戰綫，但除了大土地占有者以外，它們还是反对专制国家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的众議院是三級选举制度的产物，它对于容克的国家是不合适的。需要建立和它相对抗的东西，这种对抗的东西在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法中可以找到。

在一个現代的警察国家里，在一个受过精神训练和軍事训练的国家里，只有极少数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是独立的！单是我国这些絕對服从并且也不能不服从当局意志的农民，就占全体居民的三分之二。

俾斯麦公爵估計到了这一情况，他并没有打錯算盘。依靠普遍选举法的帮助，他清除了有产階級反对派，在“国会”中得到了馴服的多数，这一点三級选举制是永远也不会給他的。

可見，从上面恩賜普遍选举法，根本不是为了使它成为民主的杠杆，而是为了使它成为反动派手中的武器。

这个普遍选举法在我国比在法国在更大程度上处于政府的严密监督之下，因为法国人民在政治上比較有經驗，他們連續经历了三次革命，現在又处在第四次革命的前夜。可以肯定，在普魯士，凡是政府认真反对他的候选资格的代表，都不可能选到国会里去。我可以提一下最近在汉諾威举行的选举，那里反对派的傳单被沒收，他們受到无数阻碍。要知道这里只涉及到不妥当的但不是危險的的候选人問題。如果政府想动用他的全部力量（我說的是合法地使用这一力量，因为“有文化的”专制制度几乎永远罩上合法的外衣），那末它能够很容易地阻碍艾瓦特¹⁶的选举。我們假定，出現了一位政府不願意在“国会”中看見他的候选人，政府就可以沒收（根据合法的理由）介紹他竞选的報紙，沒收（根据合法的理由）竞选宣言，禁止（根据合法的理由）竞选集会，或者允許竞选集会，但

以后(根据合法的理由)加以解散,逮捕(根据合法的理由)发言拥护候选人的人,逮捕(根据合法的理由)候选人本人。

不久以前甚至逮捕了“国会”代表,如果民族自由主义者不从俾斯麦的微笑中猜到这次逮捕毫无根据的话,他直到今天还会在监狱里头。

我们假定,政府(由于相信自己的力量或由于政治上的考虑)不动用自己的暴力机关,竟实现了社会党人中某些政治空想家的幻想,把社会民主党的多数选进了“国会”。这个多数应该怎么办呢? Hic Rhodus, hic salta!^①改造社会国家的时候来到了。这个多数通过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决议,进入了新的时代——然而不是这么回事,只要一调大兵就可以把社会民主党的多数赶出神殿,有些顽固分子如果不愿表示屈服,那就会有几个警察把他们带到班房里去,他们就会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他们那唐·吉珂德式的行动。

革命不能靠当局的批准来进行。社会主义思想不能在现代国家的范围内实现。要实现社会主义思想,必须推翻这个国家。

和现代国家决不和平相处!

破除对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法的迷信!

我们将像从前一样参加选举,但只把选举当作宣传的手段,我们不放过机会向大家指出,投票箱不能成为民主国家的摇篮。只有在消灭警察军事国家以后,普遍选举法才能对国家和社会起决定的影响。

最后简单地谈一谈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它们现在存在于德国,并且在“国会”中也有代表,它们正符合于我国的各种党政

^① 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拉丁文)此语出自伊索的一篇寓言“说大话的人”。说大话的人吹嘘说他在罗陀斯时跳得很远,别人皆以不必自吹,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来看看。——译者注

派別。

我們首先看(因为在这里談馬克塞·基尔歇博士¹⁹是毫无意义的,他把階級矛盾說成是“誤會”,并自願在資產階級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像警察一样替資產階級效劳——special constable^①)普魯士王國宮庭社会主义,或者封建社会主义,其代表是瓦格納先生。順便指出,这位先生为俾斯麦公爵建立了一个普遍选举法机关。瓦格納先生不是自己負責要去搞社会主义,而是受了上面的委托,这一点可以从无数的事实中看出来。我只要提起这样一点,最高法院宣布全德工人联合会是“非法的”,但警察却容許它存在。还有两个大家知道的小小事实也值得一提。

当“北德总汇报”²⁰同俾斯麦公爵建立了某种关系,因而我不得不退出該报的时候,布拉斯²¹从自己的机关报中撥出两栏篇幅,供馬克思、恩格斯和我支配,并且指出,我們可以直接地公开地写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章,可以不采取任何預防措施,可以用最直言不諱的形式。曾經受到我們据說是不正确判断的政府,坚决要替穷人,替无产阶级做些事情。我当然拒絕了这个建議。我們不能靠上帝的恩賜,使工人运动有利于专制制度。

順便說一下,这件事情发生在拉薩尔公布自己的“公开答复”²²以前,这最好不过地证明,并不是拉薩尔的鼓动第一次促使政府去“研究”社会問題(而这却是拉薩尔的朋友和敌人常常加以肯定的)。

第二个事实:在討論減輕东普魯士貧困情况的措施的委员会會議上,該委员会的一位进步委員开始抱怨半官方和官方向某些社会主义的要求献媚,在国内占第二位的一位人物(即皇太子,如果不把俾斯麦公爵看成是国内最高人物的話),回答对他的抱怨道:“这就是俾斯麦公爵的坚强意志。他所持的观点是:保护社会

① 非常时期的临时警察。——譯者注

主义要求是麻痹民主党影响的最好手段。”

第二，我們還有**民族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站在“1866年創造的条件的”基础上，接受国家变革，认为本位主义的北德联盟的宪法可以改善，并且力求加以改善。民族自由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正像民族自由主义的现实政客一样，由于他們的老实，竟滿怀着幸福的狂热信念，相信尽管有各种妥协，他們能够使自己的原则保持純洁，并且最后他們能巧胜警察军事国家。布拉恩先生、米凱尔先生²³及其伙伴們的慘敗，預示了等待着他們的命运。这一派的荒唐行为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下列事实中：民族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同民族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携起手来，而这一资产阶级的社会統治又是他們想要摧毁的。

民主社会主义同这种民族社会主义及上述的封建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后两种社会主义把社会問題和政治問題分开了。民主社会主义深信政治問題和社会問題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它驕傲地拒絕了同現存制度的任何協議，力求为社会爭取一个民主的国家，以便在社会主义的原则上組織社会。我們正是这种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只有我們才有权称自己为社会主义的党。其他的人不过是一些集团或宗派。我們是**社会民主党**。

我們并不像有人所罵的那样是悬在空中的。我們只是与統治制度(無論在政治上和社会观点上)毫无共同的地方。我是一个共和主义者。我生活在一个君主政体的国家里，这并没有使我成为一个君主主义者。

力量我們当然是承认的，但只作为一种**事实**，而不作为一种权利。我們承认力量，把它作为一种事实，在这种力量还没有失掉作用以前，即在还没有一种更大的力量能够和它对抗以前，我們將容忍这个事实。我們不会一动不动地抄手坐着，我們會利用統治政权留給我們的各种武器来反对这个政权。可見，我們“估計到了現存條

件”，但是在符合我們的原则和政治遠見的唯一形式下估計到的。

法国民党在这方面是我們的光輝榜樣。波拿巴实行国家政变以后，頒布了普遍选举法，并造起了一座金橋，这座金橋必須从12月2日流洒的鮮血的海洋通向民主党，通向人民，通向工人。

法国民党仍然忠实于自己的原则（这是它的不朽的榮譽），記住了自己的仇恨，輕蔑地拒絕了暴君統治者的誘餌。从那时以来，已經过了十八个年头。有少数人像奧利維耶一样，不能抗拒成就的誘惑并且走过了金橋，他們遭到了一切正直人士的鄙視，額上燙上了背叛的烙印，而法国民党面对面地反对暴君专制，决不妥协，坚决相信自己的胜利。

我們也不会走这条金橋。我們知道我們的时代会來到的，我們安靜地等待着那些被“成就”的太陽孵化出來的蟄蟻的死亡。

我們不能阻止政府企图把工人問題当作法宝，但我們能够阻止并且正在阻止政府这一企图的实现。我們能够而且一定不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階級斗争，服务于反动派的利益，服务于容克的利益。如果我們能够像进行社会斗争时一样热情地进行政治斗争，我們就能够做到这一点。我知道这在普魯士是很难完成的，但是这必須完成。首先工人階級必須拋棄人工培育的并得到它支持的对“市民民主党”的不信任，这个党的代表是雅科比。

要想把党搞糊塗，只要使用某个模稜兩可的字眼就行了，这种字眼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釋。“市民民主党”一詞就是这样的字眼，就是这种紛爭的根源。

“市民”一詞有三个完全不同的意义。首先，它是指“公民”，这里包含着政治上平等的概念。第二，它是指“小市民”，德国城市小市民的社会地位和利益使其倒向工人。最后第三，它是指“资产阶级”，也就是资本家，他們靠剝削工人过活，并力求永远保持这种剝削。

对于工人来说，由于“资产者”这一概念所引起的仇恨，把“市
民民主党”一词变成了骂人话。但是，难道资产阶级是民主的吗？
相反，资产阶级懂得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它仇视民主
并具有民族自由主义的情绪。更妙的是那些猛烈攻击资产阶级反
对者雅科比的人，他们一面称他是“市民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民
主党人”，一面在政治上和资产阶级相勾结，并帮助资产阶级保
存其社会特权！这就向你们证明，斥责“市民民主党”的人不是非
常近视，便是十分虚伪。

我承认雅科比还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提出的政治
问题总是比社会问题多，这和对立策略一样，是一个大错误。但是
毫无疑问，对他来说真理和正义高于一切，他大概会完全倒向我们。
如果他现在还大半是个政治家而不是社会主义者，那这不应该
阻碍我们去握他向我们伸过来的手。我们不希望在次要问题上
和朋友争吵而有利于敌人。未来将属于以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
和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民主。

1848年3月，每个人都是民主主义者。当时运动具有重大的转
变，事情很明显，或者丧失一切“成果”，或者必须进行真正的彻底
的革命，以满足战斗无产阶级的正当要求，那时资产阶级民主派，
确切些说是玩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由于极度害怕共产主义的
幽灵而离弃了工人阶级。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现在在哪里呢？
“老的民主派”，1848年的代表，不是像通常所说的那样“落入”，
而是走到了他们该去的地方，走到了他们应当走到的地方。由
于1848年后工商业的巨大活跃，经济矛盾刚一发展起来，他们就
从不自觉的资产者变成了自觉的资产者。这些资产阶级民主派
在精神上还没有死亡和堕落，我们在一切比较进步的民族自由主义
的队伍中都可以看到他们。他们从来也不是民主主义者，而
不过是一些糊涂虫，他们陶醉在一些连他们自己也不了解的空

話里。

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也不可能不是社会主义者。以雅科比为代表的民主派，应该在社会问题上表现得比以前更坚决，而社会主义应该在政治问题上采取比以前更坚定的立场。只有当这一点能够实现的时候，只有当社会主义派别和民主主义派别不相互斗争，而相互加强和协助的时候，才可能产生重大的大规模的社会民主运动，它有足够的力量来摧毁任何反抗。

为什么目前社会民主党还这样软弱呢？我知道这个问题是现在热烈争论的对象，但是这些争论是雷声大雨点小。我站在后台，我认为（更不必说问题的道德方面）在有关我们力量方面欺骗大家和我们自己的党，是非常不明智的。那末，为什么我们的党现在这样软弱呢？为什么极大多数的工人要离开它呢？尤其是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在柏林只有那么几个拥护者，不久以前由于顺利进行的罢工²⁴它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下联合几百个人呢？从几万个人中只联合了几百个！

为什么？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现在的社会运动被反动派所利用，这一运动有利于反动派。这一理由充足的观点，制止了具有民主本能的群众。

当对社会民主党政治立场的任何怀疑被消除的时候，当社会民主党在不削弱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同时也进行政治斗争的时候，我们就会拥有工人群众，我们就可以说：“柏林是我们的！”那时整个德国都会跟着我们走，因为柏林住着主要的敌人，这里会发生决定性的战斗。柏林的被奴役，也就是整个德国的被奴役，德国的解放一定在柏林取得！

报告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对北德工人联合会一个会员（阿尔

姆帕尔斯塔先生²⁵)的意见,李卜克内西回答说:

“前一位发言人用自己的论点向我们证明,社会主义和民主分离可以把我们引向何处。对他来说,民主主义者和资产者是同义语,按照这个逻辑,工人自然应该是反革命分子了。

我觉得我业已完全证明,我既不怕‘国会’議員先生們的訕笑,也不怕他們的狂叫。我可以說,我对这些先生比对任何人都更加不敬,我这样做,是为了表明我对‘国会’及一切与其有关的东西的意见,但不能經常这样做。这样的发言如果經常重复,就会失掉价值。在‘国会’議席前面 Pour le roi Prusse^① 宣傳社会主义理論,这个任务我认为对我是非常可耻的。

我根本不认为实际斗争必須在政治范围内进行。远在1864年,我就公开捍卫工会,自此以来我一直全力协助組織工会。然而就是在这里,也应该永远注意到最終目的,注意到原則。否则,在为物质利益,在为提高工資的激烈斗争中,很容易忘記:整个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須改造,雇佣劳动本身必須消灭。

还有一个意見。阿尔姆帕尔斯塔先生认为,我们会在‘国会’中逐渐获得多数。一个很小的数学計算可以作为对这一点的很好回答。我們現在在‘国会’中有七个‘社会民主党人’。我們假定,我們以后在每次新的选举中都比前一次多得七張当选证书(这样的假定,对我们來說当然是极其令人滿意的)。‘国会’議員一共有297人。可見,要我們获得多数(至少149席)必須經過63年。看吧,如果阿尔姆帕尔斯塔先生和他的朋友願意等到1933年的选举,那就讓他們等吧。用令人快慰的、企望将来的諾言,来制止工人参加现代的政治斗争,我們早已认为这是社会民主党的一种犯罪行为。”

① 向普魯士國王(法文)。——編者

悲喜劇式的結尾

Habent sua fata libelli①

不仅是书本，就是演說也有奇怪的命运。无论如何，上面那篇演說有这样的奇怪命运。在1869年8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确切的日期我已经忘记了），邮递員交给我一封盖有“柏林”邮戳的信。陈旧的式样和用深灰色的吸墨紙做的信封，立刻說明这封信来自官方。我好奇地拆开公文，知道有一位普魯士国王的檢查官舒茨先生注意到了上述那个报告，他說他发现这个报告“辱罵了普魯士国王政府”。根据各种大小警察官（他們的出席使5月31日的會議感到光荣）的筆記，我似乎說过，

“現代德国制度，不过是違法的结果，它依靠宝剑的力量。”

我是否确实說过这些話，現在記不起来了。类似这样的話，我无论如何是說过的，我把俾斯麦的国家政变，同十二月英雄发动的国家政变作了比較。不管怎样，“違法”一詞触犯了舒茨先生，触犯了这一位 *in partibus*② 普魯士法律国家的官方代表。而且，他在热衷于法律的时候，完全忘記了他 *in esse*③ 是普魯士“軍事国家”的公民，“依靠宝剑的力量”这些話对他來說也是犯罪的。我不想对这位先生有不公正的行为，因此我乐于假定，他对我的仇恨只是由于我的錯誤引起的，这种錯誤无疑证明我在軍事方面的完全无知。我的錯誤在于，我把古代異教徒的和中世紀的“宝剑”，当作軍事力量的象征，却没有把現代文明的代表“撞針枪”，当作軍事力量的象征。无论如何，舒茨先生是上过“邏輯学”必修課的，他

① 书本有自己的命运(拉丁文)。——編者

② 紙面上的(拉丁文)。——編者

③ 实际上(拉丁文)。——編者

认为有必要用下面的結論来证明这一点：“现代德国制度是普魯士政府的政治的結果，因此，把政治和違法混为一談，就是辱罵这种政治。”这个思想还可以这样表达：“现代德国制度是建立在普魯士政府的政治基础上的；普魯士政府不可能有不法行为；違法就是不法行为，因此，把普魯士政府同粗暴的違法混为一談，就是辱罵普魯士政府。”或这样表达：“普魯士政府在1866年有了違法行为，它是根据法律这样做的。說它破坏了法律，是不对的。李卜克内西这样說了，因此，他應該得到懲办。”根据这一邏輯結論，舒茨先生建議柏林市法院对我起訴，譴責我破坏有名的101条（激起仇恨和蔑視）。于是，柏林法院（其成員也上过邏輯課）就用上述那封深灰色吸墨紙的信通知我，叫我务必于1869年9月17日早晨10点45分到达柏林市法院（克洛斯坦加謝76号一樓），听候口头审訊。“如果您沒有到院，”那封深灰色吸墨紙的信威胁道，“法院将进行缺席审理并作出判決，或将該案推迟，法院将命令把您扣押并另訂日期將您遞解到庭。”“扣押”，“遞解到庭”，这說得相当认真。我出了一头冷汗，自我进柏林市監獄以来永志不忘的臭虫味儿，又冲进了我的鼻子。幸亏我記起了一句古話：“紐倫堡人不吊死一个人，甚至不吊死一个落在他們手里的人”，于是，我就薩克森还没有完全“兼井”一事对上帝贊揚不已，就把深灰色吸墨紙的信連同其他廢紙一起扔到編輯部的字紙簍里，收拾好旅行箱，滿不在乎地到巴塞爾参加国际代表大会去了。

我又忘記了我的柏林演說和那封深灰色吸墨紙的信。但是柏林市法院的記性很好。我从巴塞爾回来大約两星期以后，邮遞員給我送来第二封深灰色吸墨紙的信。这封信的外形近似第一封信，正像一个鋼盔近似另一个鋼盔一样，但其内容和第一封信有些不同。不过，它的有意无意的可笑情况却是一样的。第二号信这样說道：

以国王的名义

为1869年兀字35号对作家威廉·马尔丁·菲利普·赫利斯基安·刘特维格·李卜克内西进行侦查一案，柏林皇家市法院、侦查处、违法案七组，特于1869年9月17日召开会议，出席会议者有主席市法院法官梅斯涅尔、陪审员封·勃莱篤夫伯爵和克林乃耳。会议经过口头侦查认为，按照法律，作家威廉·马尔丁·菲利普·赫利斯基安·刘特维格·李卜克内西犯有辱罵政府法令罪，必須处以三月監禁并令其負担訴訟費用。

根据法律

理由：

被告威廉·马尔丁·菲利普·赫利斯基安·刘特维格·李卜克内西，生于1820年3月29日，住居莱比錫。該被告曾因驅逐出境后擅自回国被柏林皇家市法院依法判处三月監禁，在本案中，該被告在深知法定日期的情况下，并无正当理由竟拒絕出庭受訊，根据1849年1月3日的命令第51条，这一行为应当认为是逃避受审。根据警察大尉貝叶尔和警察中尉利特凯的由于服务誓言而更加有力的证詞，应当认为业已证实下列情事：

1869年5月31日，在柏林利登街恩格尔哈特住所举行了民主工人联合会的公开集会，上述二证人受命前去观察該會議究屬何种會議。在該會議上，被告做了一个关于社会民主党政治立場的报告。被告在报告中宣称，俾斯麦像法国拿破侖一样，于1866年在德国实行了国家政变。于是被告逐字逐句地說道：

“現代德国制度是粗暴地违法的结果，它依靠宝剑的力量。”

被告在“俾斯麦”的名义下，无疑指的不仅是这一位国家活动家，也不仅是俾斯麦本人，而是俾斯麦所鼓励的并得到最高政府首肯的普鲁士外交政策。其次，现代德国制度的建立，依靠了这一政策和普鲁士政府的行动，而被告竟将普鲁士政策和粗暴的违法行为混为一谈，硬說普鲁士政策的基础不是法权，而是暴力。有鉴于此，法院坚决认为业已查明屬实。

被告于1869年5月31日，在柏林用公开辱罵的方式，企图激起人們仇視政府的行动和法令。

因此，被告犯了刑法第101条中規定的违法罪。

鉴于被告在联合会的公开集会中讲述自己的观点，而这种观点又极能损害政府的声望和威信，——特别在政治上较少开展的人们中间，法院认为应给以监禁三月的适当处分。根据1849年1月3日的命令第178条，法院认为必须由被告负担诉讼费。

本文件以皇家市法院印章及规定签字法为凭。

皇家市法院

侦讯处

违法案七组

梅斯涅尔

菲凯尔

1869年9月17日，柏林

(盖章处)

在諷刺杂志《Kladderadatsch》²⁶（“喧鬧”）拋棄了僕役制服，重新成为一本机智的杂志以后，我会把对这一法院判决的批判，交给它去发表。确实，在我的听众，这些“政治上（比舒茨、梅斯涅尔、勃莱篤夫和克林乃耳）较少开展的人们”中间，未必有一个人，会像舒茨、梅斯涅尔、勃莱篤夫和克林乃耳那样肆无忌惮地对待邏輯和合理的看法。无论如何，判决的理由表明，幽默家不仅在被告的长凳上可以碰到，而且在法官的安乐椅上也可以碰到。如果我把俾斯麦称为热爱法权的人，把分割德国称为合法的行为，把宝剑、撞針枪、克虏伯后膛枪和薩多瓦战役²⁷，都称为温和和可爱的玩艺儿，那末，快乐的“柏林法官”不会判处我监禁三月，而会呈請授給我勋章。

然而，只有判决他們还感到不够。必須把这个愚蠢的玩笑开到底。为了“使事情胜利結束”，就要求我真正坐三个月牢。因此，柏林人要莱比錫当局引渡我。但是，莱比錫当局告訴柏林人，薩克森不理解这样的玩笑。柏林人几次被这种拒絕难住以后，宣称，如果能依靠全帝国的压迫制度，即依靠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Rechtshilfegesetz），把我送到薩克森監獄里去坐三个月牢，他們会感到

滿意。但是在这里他們有一个小小的不幸，他們竟还没有讀过他們引用的那一條規定。然而，萊比錫的同人們对这个新的玩笑比較諒解。很快我就发觉，这些萊比錫人非常願意把我关到本市区監獄里去。事实正是这样！通过了一个这样的決定。我的辯護人和朋友弗萊塔格，以我的名义对这一不友好的兼併企图，提出了下列抗議。

給本市皇家區法院

柏林皇家市法院建議本市皇家區法院將我監禁三個月。這一處罰是上述市法院作出的，理由是硬說我辱罵政府法令。

皇家區法院根據不可理解的理由，決定接受這一建議。

但是，我對普魯士皇家市法院和薩克森皇家區法院的這種行動方式，提出下列意見。

一

我被控告的罪行（如果我犯了這種罪的話），是政治罪，在這方面關於引渡、逮捕等等的一切現存法律，不能有擴充的解釋。

二

根據附件 A 和 B，我被判犯有刑法第 101 條規定的罪行，即我用公開辱罵的方式，力求激起人們仇恨政府法令。

但按薩克森刑法，自修改刑法時廢除了所謂“關於仇恨和蔑視條”以後，上述罪行不能成立。

三

根據 1839 年 11 月 30 日薩克森—普魯士公約第 35 條（該條不但沒有被關於給予法律援助的同盟法律所廢除，却被該法律第 45 條所確認），罪犯或其他犯有破壞國家刑法罪的人，不應被他們所臣屬的那些“國家”引渡，而應在當地交付法院審判並聽從法院對他在另一國所犯罪行的判處。因此，另一國訴訟審訊不能對上述人員進行缺席審理。

可是，從附件 B 中可以看出，普魯士市法院現在要求薩克森當局執行的

法院判決，是根據對我不合法的缺席審理作出的。

上述公約第 36 條在這裡並不適用，相反，它證明柏林市法院的要求是不合法的。

四

根據關於給予法律援助的同盟法律第 25 條，如被告的罪行是政治罪行，或按被告所在同盟國的法律，這一罪行不能進行處分，那末就不應進行引渡。

這兩個條件在本案中都有了。其次，這一法律的第 27 條說道：

“如果按照第 25 條第 1 號和第 3 號的規定不能進行引渡，而根據該國法律，上述案件又不歸別一法院管轄，那末審訊工作應該在被告所在的國土上進行，而且要由被告居住的該區法院進行。”

這一段話證實了上引公約第 35 條，並且清楚地說明：指控我有罪而對我進行的缺席審訊，是沒有法律根據的；沒有一個薩克森法院，有權執行根據這一審訊作出的判決；普魯士皇家監察機關只能在我所屬的司法機關，即萊比錫區皇家區法院提起公訴。

五

上述論據是清楚的，是以對現存法律的無可爭辯的正確解釋作根據的。

但是我們甚至可以假定，普魯士司法當局在控告住在薩克森的人犯了按薩克森法律不能受到處分的政治罪行時，能夠對這些人作出缺席判決，而薩克森司法當局又必須執行這種判決，那末，上述同盟法律第 33 條清楚地說明，只在由這些判決確定的處分是課以罰金或剝奪 4 星期以內的自由時，同盟中一國的司法當局才必須執行同盟中另一國的法院判決。由此可見，上述情況不適用於本案，因為本案判決監禁三個月。

由於上述情況，我認為完全有根據對柏林市法院和本市皇家區法院的行動方式提出抗議，並請求皇家區法院拒絕違背現存法律的皇家市法院的要求。如果皇家區法院駁回我上述請求，那末我請區法院把本聲明看作是對它的行動的控告，並把關於將本案送交上級機關事宜，通知我委託其辦理本案的代理人——本聲明的作者。

威廉·李卜克內西

1869 年 10 月 18 日，萊比錫

抗議發生了作用。萊比錫區法院的決定撤銷了，但柏林市法院却堅決聲稱，它在關於法律援助的規定里，看到普通人的眼光所看不到的東西。

但事情還沒有結束。好戲還在後頭。

有一位復仇者，而且是一位非常強大的復仇者，即普魯士政府，出來替遭受失敗的“坐在法官安樂椅上的幽默家”辯護。這位復仇者在這一悲喜劇式的案件中（如果可以這樣表達的話），擔當了一個悲劇的角色。隨後發生的事情，都為神秘氣氛所籠罩，無論柏林或德累斯頓都非常注意保守這一秘密。現在確苗知道的只有兩點：

(1) 普魯士政府建議薩克森政府對我提起訴訟，控訴我犯有辱罵同盟機關罪，因為我把它們稱作粗魯地違法和使用暴力的產物。

(2) 薩克森政府接受了這一建議，並命令對我提起柏林所希望的訴訟。

恐怕從來沒有一個政府對另一個政府提出過比這更無禮的要求，也從來沒有一個政府對另一個政府表示比這更恭順的服從。

只要想一想過去的事情：1866年薩克森站在德意志聯邦²⁸和奧地利方面；薩克森軍隊站在奧地利方面同普魯士打過仗。因為當時薩克森政府認為普魯士的行為是違法的，它不願同這種違法行為妥協，而普魯士人却在吉特希納²⁹附近按照普魯士軍隊的命令，用炮火襲擊薩克森士兵。

這同一個普魯士政府，要求這同一個薩克森政府對關於這一事實的簡單敘述提起訴訟。而薩克森政府竟服從於這一要求！可見，薩克森政府對新同盟者表示了過分的忠誠，把過去對老同盟者的忠誠宣布是一種罪行，而且這種罪行又是如此嚴重，只要敘述了以下事實，即說明在1866年的事件中，真理不在薩克森政府的勝利的敵人方面，而在薩克森政府方面，那就應當提起訴訟！

后来，連德累斯頓大概也感到了这一訴訟的全部……独特性。事实是，薩克森政府名义上是对我提起訴訟，实际上是对自己提起訴訟，也就是說，1870年的薩克森政府对1866年的薩克森政府提起了訴訟。这一訴訟很快陷入僵局，經過长期間歇以后，只有两三次还表现了微弱的生命迹象，此后就完全被有名的“叛国案”淹沒了。这一“叛国案”为实际利用我的“柏林演說”，提供了很好的借口（这一借口得到了用空气来造砖头的吹牛大王們的狂热支持）。但是关于这一点，我没有必要在这里加以談論了。

再見吧，讀者，你們欣賞我在你們面前打开的一頁現代史并从中取得教訓吧！最后，我要感謝柏林快樂的愛开玩笑的一群人，很可珍貴的一群人：舒茨、梅斯涅爾、勃萊篤夫和克林乃耳，感謝他們在嚴重的鬥爭中製造愉快的插曲和樂事。然而，這還不是最嚴重的鬥爭。我們最嚴重的政治戰鬥，還帶着相當柔和的性質。在萊茵河的那一面是薩托里³⁰，在這一面不過是古別都斯堡³¹。

或者更正確些說，現在還只有古別都斯堡吧？

威·李卜克內西

1872年6月7日于萊比錫區監獄

跋

[1889年倫敦版]

本演說的結束語，旨在反對當時系統宣傳的幸而現在已從生活中消失了的一種想法，這種想法認為，工人可以靠努力利用普遍選舉法的手段，在不遠的將來在“國會”中得到多數。對擁有397個議員的全帝國國會來說，我做的算術計算，比擁有297個議員的北德國會更少有好的結果。

在現代條件下（這必須特別強調指出），社會民主黨在議會中

取得多数是不可思议的。取得这种可能性的条件还应当加以创造，我們也能够加以创造，不过先要用鼓动和宣传的办法使群众接受我們的世界观，并且利用組織方法发展我們的力量。議會活动不是我們的目的，而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它应该帮助我們在国会以外，在人民中間，取得相当巨大的力量，以使立法會議不能反对工人阶级的要求。

关于本演說中提到的約翰·雅科比，我认为我必須声明，两年以后，即在我和倍倍尔因莫須有的“叛国”罪而被判处两年监禁以后不久，他公开而坚决地宣布自己是社会民主党的拥护者，是社会民主党党员。

我談的有关小资产阶级的話，現在似乎已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德国小资产者成批地轉入阿凱尔曼³²的党内，这个党在它的旗帜上写着：“退向行会制度和行会老規矩！”但是，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精神病，他們能够摆脱这种疾病，只要經過必不可免的體驗以后，他們会相信，社会庸医們的仙水只能加重灾难和加速无产化的过程。

我对本演說中的結束語特別感到滿意。我当时所幻想的一切，都出乎意料地得到了实现。今天，誰也不会觉得我們宣告“柏林是我們的！”是“信口雌黃”。

我們看到，我們的目的即将实现。不管怎样，回顾一下1869年，我們就能看出，我們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我們前进得多么迅速。我們前进的速度不会放慢。相反，巨浪走得越远，就卷得越快，就越容易克服它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威·李卜克内西

1888年12月

不要任何妥协， 不要任何选举协议！

这本小册子，不像我第一本论述策略的小册子^①那样是一个报告，然而这本小册子的依据，也同样是我在今年夏天按照我的柏林选民的愿望所作的一个报告，该报告主要论述了最近的巴伐利亚议会选举，也一般谈到了妥协的问题。各方面有时企图使我党接近资产阶级政党的顽固做法，特别是关于必须参加普鲁士议会选举的大力宣传，在某些柏林选民中间，甚至可能在全德同志中间引起了忧虑，担心党内是否有这样的意向；即使不是以把社会民主党拖进资产阶级政党的阵营直接作为自己的目的，也无疑在追求这种目的。这种忧虑的原因，是伯恩斯坦³³的忏悔录。这些忏悔录堂而皇之地背弃了一位同志（他在此以前一直被认为是我们原则的捍卫者）所应有的社会民主党原则，背弃了社会民主党的邪说，承认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唯一的救世信仰。伯恩斯坦的文章，没有提供任何新的独立见解，它只承认社会民主党的敌人十年来多次对社会民主党进行的攻击是全部正确的。不管伯恩斯坦的著作本身多么微不足道，但由于造成混乱的关于参加普鲁士议会选举的宣传和 Isegrim'a³⁴ 反对民警制、捍卫军国主义的倒霉文章，不能否认这本书具有征兆性的意义。

党在反对居于统治地位的反动派的苦役法和其他粗暴压制的

^① 指“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立场，特别是对国会的政治立场”一书，1893年柏林“前进报”版。

企图的斗争中，开始忘记希佩尔和伯恩施坦的历史，等待着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进行彻底的清洗，正在这个时候，忽然传来了巴伐利亚进行了政治“交易”的消息。我们早就习惯于“巴伐利亚的特点”；我们知道，不能用北德的尺度来衡量巴伐利亚和整个南德的事务。如果直接靠近首都的柏林同志，不得不重视只在巴伐利亚才有的那些“特点”（虽然是另一种的），那就应当对他们的忍耐感到惊奇。我们知道，哪儿的宗教分子参与政治，哪儿的中派阻碍正常的政治发展，那里的阶级意识就容易受到其他思想的压制。除巴伐利亚以外，我们已经得到订立十分荒诞的选举协议的消息。但是，这次在巴伐利亚发生的，毕竟是一种新事情，就整个形式来说，协议不是不声不响地、偷偷地、由几个同志不让群众知道背着群众订立的。不，协议是由两党之间，是由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同巴伐利亚中派领导人之间订立的。

这一事件在最广大的党员群众中引起了巨大的波动，成了他们密切注意的对象。起初，惊讶和愤怒是难以形容的。由于巴伐利亚议会选举也不是直接的选举，就不能马上提出抗议，因为这样做只会对处在斗争热潮中的巴伐利亚同志有害，也许还要使自己承担重大的责任。因此，最初只有“政治交易”的巴伐利亚捍卫者有机会发表意见。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凡是看见把党有计划有步骤地拖到泥潭里去的一切征象的同志，其忧虑都达到了顶点。柏林同志们跑来找我。我对他们讲了《Vorwärts》³⁵对巴伐利亚政治“交易”还没有表示自己态度的原因，但我并不向他们隐瞒，我对妥协的看法同整个编辑部的观点不一致。过后，我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尽管用了非常温和的语调，但被认为是对他们进行了严重的攻击。最后，我在柏林第六选区选民联盟会议上发挥了我的观点。虽然，为了寻求良好的和解，我拒绝了对巴伐利亚同志表示谴责的建议，但是巴伐利亚党员同志还是由于这次会议而对我和柏

林同志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有时还采用了相当尖锐的语调。誰感到自己理屈，誰就会用尖刻的语调来掩饰自己站不住脚的论据。因此，我总是把我的对手的粗鲁当作不自主的恭维，一点也不因此而感到难受。

几乎在巴伐利亚“交易”进行的同时，法国的社会主义者米勒兰³⁶参加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这成了法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分裂的原因。我們最坚强的法国同志，法国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奠基者盖得³⁷、拉法格³⁸、瓦揚³⁹，反对米勒兰参加反动资产者瓦尔德克—卢骚⁴⁰和镇压公社的有名刽子手加里腓⁴¹的内閣。我們优秀的同志們同社会党議會党团分开了。他們认为这个党团背离了阶级斗争的基础。

妥协策略的危险性在这里充分暴露了出来。当“前进报”在7月28日登載了一篇捍卫妥协策略的题为《Augenblicks-Kartelle》（“暫时的協議”）的文章时，我就决定根据柏林和郊区同志們的委托写一本小册子，論述（据我了解，这是完全符合絕大多数柏林同志的观点的）策略問題，特别是論述妥协和訂立选举協議問題。我尽力以此使党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有机会再一次全面考虑背棄我党久經考驗的原先的策略所产生的后果。

我在这里談到我們的策略的时候，撇开了一切表面的和次要的东西。我只是在我党剛成立时（它不同于一切其他政党）策略这个詞對我們就具有的那种意义上，即阶级斗争的策略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詞的。这个策略时常改变自己的形式，但实质却始終如一。这就是我們无产阶级的固有阶级策略，这个策略把我們同立足在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上的其他一切政党区别开来，使我們同他們沒有共性。

这本小册子是在暑假期間写成的，确切些說，是在行程中写成的，在家里，在田野里，在山上，在火車車廂里，一有机会就写。这

当然可能影响它的完整性，但是这却证明我对我们的事业是十分认真的，我甚至为它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

威·李卜克内西

1899年8月

关于各种形式的妥协问题，是我们党一开始它的政治活动就关心的问题。现在我没有足够的时间，而且这里当然也不便于对这个问题的历史作详尽的阐述。现存的有关妥协问题的党的决定，反映在科伦、汉堡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科伦代表大会于1893年10月28日通过的决议写道：

“代表大会注意到俾斯麦自己称为一切选举制中最可怜的普鲁士三级选举制，使社会民主党不可能稍微顺利地独立参加普鲁士议会选举；其次，注意到同敌对的政党妥协，是同党直到现在选举时所一直遵循的基本原则相矛盾的，因为这必然在它自己的队伍中引起风纪败坏、纷争和意见分歧，代表大会宣布，普鲁士党员同志应当放弃任何参加议会选举的行为。

其次，代表大会决定：代表大会注意到各邦的选举制是反动的选举法的真正典型；注意到普鲁士三级选举制的特殊寡头性质剥夺了工人阶级选派自己代表进入议会的可能性，建议党员同志在各邦开始进行广泛的和积极的鼓动，宣传实行同我们纲领的要求相一致的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议会选举法”。

三年之后，汉堡代表大会于1897年10月9日通过了下列决议：

“科伦代表大会禁止普鲁士党员同志参加以三级选举制为基础的议会选举的决议予以撤销。凡情况允许党员同志参加最近的普鲁士议会选举的地方，建议参加选举。各选区参加选举的可能

性如何，這個問題由各該選區的黨員同志根據地方條件決定。

同其他黨派妥協和訂立協議是不能允許的”。

贊成撤銷科倫決議的有 160 票，反對的有 50 票；整個決議通過時，有 145 票贊成，64 票反對，1 票棄權。

為了消除對漢堡決議實際意義的各種懷疑，在決議逐條和全部付表決後，主席辛格爾⁴²完全同意倍倍爾⁴³提出的建議，在沒有異議和一致贊同（關於這點已載入記錄）的情況下宣布：

“我肯定代表大會在下面這點上是意見一致的：根據本大會通過的決議，參加選舉只有通過提出社會民主黨初選人才能實現”。

根據倍倍爾的意見，同志們一開始就可能投票贊成自由主義者初選人這種做法是“決不容許”的，因為這種情況屬於同其他黨派“妥協和訂立協議”的範圍。

儘管決議的意義很清楚，儘管對決議中可能引起各種解釋的那一條也作了清楚的和權威性的說明，但是代表大會剛一開過，意見分歧就暴露出來了。有人完全違背事實和記錄的確切意義，開始對這樣一點展開爭論，說我們黨在初選時支持自由主義者初選人，這是否真是妥協，甚至提出責備，說什麼代表大會受到辛格爾的“突然襲擊”。

去年的代表大會，就在普魯士議會選舉前夕在斯圖加特召開的。但是在意見分歧的情況下，當時連想到解決這個問題也不可能，何況代表大會的日程本來已排得滿滿的。因此，當時只好把這個問題的徹底澄清拖到下一次代表大會去進行，只是為這件事情通過了一項適當的決議。

1898 年 10 月 5 日，斯圖加特代表大會一致通過了委員會起草的下列決議：

“在存在三級選舉制的情況下參加普魯士議會選舉，無論如何不能看成是對社會民主黨隊伍的檢驗，正像參加國會選舉，無論如

何不能看成是通过对我們的票数的計算来取得道义影响的手段。只应当把这种参加选举看成是取得一定实际效果的手段，即防止我們在野蛮的反动派取得議會多数时遭受危險的手段。代表大会根据上述理由宣布：不建議全部选区参加普魯士議會选举，何况普魯士議會选举的日期已經临近，不能等待目前在这个問題上存在的意見分歧得到和解，以使全党能够一致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大会授权各选区的同志自行决定参加选举的問題。如果某选区决定参加选举，而同时发生了支持资产阶级反对派候选人的問題，那末这些候选人在自己被选入議會时，就有义务坚持实行国会选举中存在的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法，在議會中坚决反对旨在进一步限制甚至取消各邦现存人民权利的一切措施。有关‘普魯士議會选举’議事日程的提案，由于本決議的通过而撤销。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決議就是这样。很明显，这个決議只具有临时性质，而在策略問題上严格遵循漢堡決議的基础。但是，某些选区的同志，认为自己有权违背这个決議而同其他党派訂立協議，这在漢堡決議的意义上說来无疑就是妥协。不久前在巴伐利亚发生的事情（同中派訂立选举協議，而亲身参加訂立協議的同志把它称做“交易”）表明：只要机会主义的触角一刺进党的策略，就立刻会洞穿它的全身。

對我們党和我們党的策略來說，只有一个合法的基础，即階級斗争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社会民主党，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够吸取力量来抵擋任何風暴和抗击一切敌人。我們党的奠基者馬克思、恩格斯、拉薩尔，使工人十分深刻地認識到我們的运动必須具有階級性，因此直到最近，我們还没有一次稍微显著的离开这条道路的情况。科倫決議是住在倫敦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报”⁴⁴編輯而受到全体同志尊敬的爱德华·伯恩施坦提出的。

在1893年以前，关于参加普魯士議會选举的可能性和好处的

問題，甚至根本沒有公開提出過。在80年代初，法蘭克福民主主義者秘密地建議社會民主黨黨員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聯合行動，以便在法蘭克福議會里得到一個社會主義的和一個民主主義的議席，但是，這個建議被同樣秘密地（沒有傳到廣大範圍中去）否決了。

下面這種看法有決定性的意義，這種協議會削弱黨的階級性，得到一個議席的好處，遠遠抵償不了在議會選舉中同另一個我們應當在國會選舉時加以反對的政黨訂立協議所帶來的壞處。

對於取得普魯士議會議席的重要性，每個人都作了正確的評價。但是下面的事實具有更重要的意義：黨自己的議席應當只依靠黨的力量來取得，而不應當依靠同這樣一些政黨訂立協議來取得，這些政黨在瞬息間可以和有共同的利益，但按其資產階級本質來說是同我們敵對的，而且永遠是敵對的。

伯恩施坦關於社會民主黨參加普魯士議會選舉的建議，只有很小的反應，根本沒有找到捍衛者，因為倍倍爾提出和論證的反對參加選舉的決議，是被一致通過的。

關於參加普魯士議會選舉的問題，過了幾年又重新產生，甚至引起了極為激烈的爭論，這一初看起來完全不能理解的事實，可以用下面兩種情況來解釋。隨着時間的推移，某些同志對三級選舉制的看法有了一定的改變。人們漸漸忘記了巧妙而一貫地實行三級選舉制的目的，是對民主思想和民主精神緊閉通道，忘記了同實行這種“一切選舉制中最可恥的選舉制”幾乎一起開始的資本主義紀元，在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出現的同時，剝奪了有社會主義情緒的群眾的投票權，甚至使早先民主主義群眾的投票權和表達意志所具有的意義化為烏有。許多在漢堡代表大會上發言的人，對三級選舉制的實質抱有那麼嚴重的錯誤觀點，可以從下面的情況中清楚地看出來：許多人幻想利用普魯士議會選舉來進行廣泛的群眾

性鼓动。許多人为其他一些也是不民主的議會选举法，特别是薩克森議會选举法获得的成就欢欣鼓舞，他們忘記了普魯士三級选举制及其强制的公开投票，实际上事先排除了所有在經濟上、社会上和政治上处于某种依附地位的人(即絕大多数居民)参加选举，仅仅这一点就使群众性的参加选举和进行群众性的鼓动成为不可能。

对普魯士三級选举制的乐观主义的自我欺騙，竟达到这种地步，許多同志十分认真地认为，似乎我們社会民主党人依靠本身的力量，不同其他党派采取任何一致行动或訂立協議，也能够得到至少几个議席。現在已經沒有人用这种幻想来蒙騙自己了。現在任何人都知道，不进行妥协或訂立初选協議，我們就不能得到一个普魯士議會的議席。两年以前是另一种情况，当时代表大会的多数受了乐观主义的自我欺騙的影响，贊成参加普魯士議會选举。

但是幸好党的最高机构記起了我們党的出身和实质，坚决禁止同其他党派进行任何妥协和協議，設法不使这种自我欺騙变成損害党和把它引上錯誤道路的行动。

漢堡決議被称为矛盾的和不合邏輯的決議。这种說法是公正的，因为，如果党像早先一样反对同其他党派进行任何妥协和訂立选举協議，那末撤銷科倫決議对它就没有任何意义。我已經指出，形成矛盾是因为一部分黨員对普魯士三級选举制的实质迷惑不解，或者得到錯誤的認識。

但是，如果从这种矛盾中得出結論(这在实际上已經发生)，說什么党认为自己参加普魯士議會选举的意願比对妥协的否定态度有更大的意义，因此，如果存在着矛盾，那末这个矛盾似乎只有通过无条件参加选举和撤銷关于妥协和協議的禁令才能消除。做出这种結論，就表示既缺乏邏輯，又不尊重党的原則和历史。

当然，在党的某些人中間(現在我要談参加議會选举的問題所以成为党的一个引起爭論的严重問題的第二个因素)，有一种离

开階級斗争的基础和站到与其他党派共同的斗争基础上去的倾向，或者说是意願。但是，其他一切党派是立足于資產階級社会基础上的，那末这种共同基础必然是資產階級社会的基础。我并不是說所有新策略的捍卫者都有这种願望；我甚至相信他們中間有許多人都沒有这种願望。但是另一些人却有这样的願望。正是伯恩施坦第一个向党建議参加普魯士議會选举，这并不是普通的偶然事情。这个策略完全符合伯恩施坦的綱領（这个綱領的目的是把社会民主党变成資產階級政党）；相反地，在那些不願意否認或者破坏我們党的階級性的人看来，这个策略絕對不合乎任何邏輯。我毫不犹豫地重复我先前的声明：在實踐中放棄我們党的基本观点，在我看来是一件比伯恩施坦的一切理論上的动摇还要危險得多的事情。有人說，資產階級政党失去了政治神經，他們喪失了自由感和正义感。这种說法当然不无根据，并且不仅适用于最近时期。除了一段不长的时期外，德国資產階級从来就沒有所謂的“政治神經”。但是不管怎么說，一般都不能否認，我們受到政治条件和經濟条件的影响，这些条件一方面促使經濟矛盾和政治矛盾極端尖銳化，另一方面导致对原則的机会主义庸俗化。此外，在德国，还有我們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落后，其后果就是完全沒有真正的自由主义政党，更不用說民主主义政党了。这一事实的自然后果，就是資產階級的一切正直的自由主义分子和民主主义分子，越来越傾向于德国唯一爭取民主主义原則的政党——社会民主党。但是同时，这些民主主义分子还远远不是社会主义者，雖然他們許多人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簡短地說，目前在德国出現了一种半世紀多以前在法国已經出現的現象，这种現象在法国各个政党之間曾經引起了不少的混乱，这就是一部分激进資產階級打着社会主义旗帜，却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质。这种实际上只是博愛人道激进主义的資產階級社会主义，給法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極

大的危害。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有助於消除原則和抹煞原則，削弱了社會主義政黨，因為它把在緊要關頭不能指靠的那些分子帶進社會主義政黨的隊伍。

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①中，對這種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作了評述，這種評述對我們仍然具有它的意義。如果由於堅決遵循階級鬥爭的基礎而獲得這樣驚人成就和這樣顯著發展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突然向後轉，並且犯了錯誤（及時防止犯這樣的錯誤曾經是我們黨的驕傲和偉大，曾經把德國社會民主黨提高到全世界國際社會民主黨的高峯），那末，這對德國社會民主黨來說就是離開了道路和根本迷失了道路。

資產階級集團對我們的恐懼和嫌惡的減少，自然使得資產階級分子加入我們的隊伍。當這種過程在不大的範圍內發生時，這並沒有什麼危險，因為資產階級分子被無產階級的多數所壓倒，並漸漸被他們吞沒。但是當資產階級分子在黨內人數很多，影響很大，因而很難溶解他們，甚至可能發生把無產階級分子排擠到次要地位的危險時，情況又是另一種樣子了。對德國社會民主黨來說，由於我國資產階級的落後，這種資產階級化的危險發生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當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分子不能在本階級範圍內找到政治上的滿足時，他們倒向我們的人數多於正常發展的資產階級國家；另一方面，實質上是資本主義的我國非資產階級政府，實行了國家社會主義，這實際上當然只是國家資本主義，但是對那些只要用似是而非的外貌和响亮的稱號就能被收買的人來說，這畢竟是某種誘人的東西，某種能夠引入歧途的東西。以兵營警察國家作為自己理想的德意志國家社會主義，或者正確些說，普魯士國家社會主義，最仇視民主。卡尼茨先生⁴⁵之流發誓說，他們是最真

^①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卷第9—125頁。

正的和最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只是对民主他们什么也不愿意知道。他们把民主当作敌人。在他们看来，民主是某种资产阶级特有的东西，而一切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和社会主义的东西正好相反的。由此得出一个甚至在某些社会民主党人中也很流行的错误结论，说什么作为某种资产阶级的东西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相反，甚至对社会主义是有害的。反对民警制的辩论或施韦泽的错误这样一些大家知道的错误认识，也导致同样的错误结论。其实，民主丝毫也不是资产阶级特有的东西，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我们不仅是社会主义的党，而且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党，因为我们懂得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割的。

60年代，俾斯麦公爵想使社会主义的“阿克戎河”⁴⁶流动起来，通过布拉斯建议《Norddeutschen》⁴⁷编辑部为我服务，过后不久，通过布赫尔⁴⁷同样建议《Staatsanzeiger》⁴⁸编辑部为马克思服务，他给我们充分的机会用任何语句来捍卫社会主义及其全部极端的结论，那当然并不是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和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在这里指导着俾斯麦公爵。无论在当时，或者直到他死，他丝毫不了解社会主义，一般说来，他从来也没有了解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动力。这位“治国之才”与其说他有教养有学识，还不如说他是一位单凭经验和使用半欺骗、半农民式的狡猾手段的人，他生活在时间和空间之外。上面提到的对社会主义者所作的建议，十分清楚地表明俾斯麦的论断的全部虚假性，说什么他永远认为社会民主党同国家的存在是不相容的。俾斯麦要利用社会主义，是为了依靠社会主义的帮助去破坏和消灭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自由主义，主要

① 《北德总汇报》的编辑施韦泽。——译者注

是破坏和消灭进步党。順便說說，这种打算的本身就确凿地证明俾斯麦沒有絲毫关于社会主义实质的概念。大家知道的魔术师学生的故事的重演，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所召唤来的自发势力比无能的巫师的政权更强有力，不是俾斯麦战胜了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战胜了俾斯麦。当时第一次在我們党面前出现了策略問題。我們是否应当为了工人的利益，以某些让步为代价支持俾斯麦反对进步党和他政治上的其他敌人，直等到我們最后十分强大的时候，再来顺利地反对他和反对以他为代表的容克军事警察国家？还是党的明智和利益要求我們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利用俾斯麦同进步资产阶级和他政治上的其他敌人的斗争，反对俾斯麦的政策，并把无产阶级組織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以便訓練好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

在一段時間內，无产阶级曾經动摇不定，但是过了几年，主要受到封·施韦澤先生支持的同俾斯麦的政策亲近的策略，受到了全德工人的唾棄，到处采用了直到今天还在党内起作用的策略。拥护和捍卫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阶级性的純洁，通过鼓动、教育和組織，推动胜利的解放斗争的进行；有计划地进行斗争，反对集中了资本主义一切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阶级国家，在这个斗争里，从各资产阶级政党間发生的一切意見分歧和冲突中取得对自己可能取得的利益——这就是这个策略的实质。

德国的资产阶级，沒有像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那样取得了政治統治。当英国资产阶级已經在二百五十年前，而法国资产阶级也已經在一百多年前扫清了一切中世纪的廢物的时候，德国资产阶级根本还不能实行资产阶级革命和在国内实现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由于美洲的发现而失去世界貿易以及与此有关的经济生活的衰落；德意志的政治上的分散性和落后性；几乎近于完全停滞的国民精神的衰敗；与人民和文化敌对的王朝利益难于置信的增

长——所有这一切阻碍了强大资产阶级的繁荣昌盛。1848年的时候，出现了实现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种缓慢的可能性，甚至就在那时候，德国资产阶级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这样做。在短期陶醉于自由以后，它重新给自己戴上了旧的锁链。由于害怕工人（它感觉到工人对自己是一种新的危险力量），它变得是反动的了（它从来也不是革命的），它反省了在它看来是“年幼无知”的自己的自由理想，投向了满脑袋只有发财这个唯一理想的政治反动派的怀抱。市民阶级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它不是对政治漠不关心，就是拥护资本主义。拥护资本主义，就是无条件地承认和支持政府，其前提是：这是阶级国家的政府，这个政府一贯捍卫资本主义的利益并实现这种利益。为了避免误会和错误的理解，我们应当搞清楚“资产阶级的”（“bürgerlich”）和“资本主义的”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由于德语“市民”（“Bürger”）^①一词含义很多，我们很容易把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应当把它们严格加以区别。在法国，“资产阶级”（“bourgeois”）一词在中世纪具有德国“市民”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发展，它逐渐具有大资产阶级的意义；我们德国人为了表明后者的概念，由此借用了法国“资产阶级”一词，而且同时也不加区别地使用德国的“市民”和“市民的”（“Bürger” und “bürgerlich”）两词。因此，就产生了表述上的混乱，有碍于清楚的理解。

我们说市民（公民）社会，实际就是指现代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或者相反地，我们说资产阶级精神，资产阶级自由，实际上就是指这样一种自由的民主精神，这种精神是市民阶级在从前反对容克和神甫时所具有的，它和同容克和神甫友好相处的资本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精神截然相反。

19世纪资产阶级内部所发生的那种变化，比任何地方都更明

^① 德语“Bürger”一词，本意是“市民”，“Bürgerlich”是“市民的”，但往往也当“资产阶级的”来使用。——译者注

显和更令人信服地说明所谓唯物史观（它认为政治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正确性。可以十分确切地证明，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及其本身的状况，是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经济的发展前进一步，阶级矛盾的发展也前进一步，同时，资产阶级同它从前的敌人——容克和神甫也接近一步，而同兴起的无产阶级则疏远一步。无产阶级为了使自己获得解放，必定捍卫全人类的平等和资产阶级曾经争取过的那些民主要求。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离资产阶级而独立并同资产阶级在利益上相敌对的阶级开始出现以后，资产阶级就不再是民主的了。在欧洲大陆各国，这种反动势力很有意思地正赶上了通常认为 par excellence（主要是）革命的时期，即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的时期。矛盾在这里只是表面化了。二月革命是推迟了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胜利，它引起了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反抗、反对和反动。在推迟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过早地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六月事变），它向资产阶级表明无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死亡，并以此迫使资产阶级奔向它历来的敌人的阵营。在法国，拿破仑被选为执政者；在德国，资产阶级在三月革命的蜜月里，焦急地等待着自己的救星来赶走红色的幽灵。因此，接替了我国1849年“革命”的那个“黑暗的反动势力”，它的基础只是这次“革命”的真正实质，只是对虚幻、欺騙、浮华的响亮言词的揭露。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既然是资本主义的，或者是处在资本主义影响下的，所以必定是反动的。半世纪前在整个欧洲大陆猖獗一时的“黑暗的反动势力”，正如不相信自己的资本主义强迫我们接受的现代曲折路线和苦役法这种“更加黑暗的反动势力”一样，同是历史的必然性。

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比英国和法国晚一些，在此以前，也没有出现上述两个国家里经历过的资产阶级经济繁荣和政治统治的时代，它的政治发展必然具有另一种性质。那里的土壤是扫除了

中世紀廢物和垃圾的土壤，这里的新生活（同英法一样的最新生活）却受到了中世紀廢物和垃圾的包围，这里正在出土的茁壮的嫩苗，被墓地上的常春藤纏住了，这种常春藤从它的吸枝所接触到的一切东西中吸取生命力，依靠死亡和腐烂过活；为了使一切健壮的能够成长的东西不致死亡，必須把这种常春藤連根拔去。在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烙印打在国家身上的时候，德国资产阶级还因自己的軟弱无力而毫无作为，它現在还不能彻底消灭有毒的浪漫的寄生者——容克和中世紀野蛮行为的常春藤。

德国资产阶级过去和現在在政治上的軟弱无力，使德国的政治生活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国家，它赋予德国无产阶级这样的使命：除了完成它本身的任务以外，还要完成当时我国资产阶级没有完成的任务。条件的本质决定策略。由于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我們应当同它作斗争；由于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受资本主义拥护和鼓励的反动派，我們或者应当給它积极的支持，或者至少也不反对它；但是在国会选举中，当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彼此竞争議席的时候則又当別論。

如果撇开施韦澤的事件不談，那末德国社会民主党自觉地和一貫地执行了“共产党宣言”就已指出的策略，即把主要斗争指向政治反动派；由于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还是自由主义的或者說是民主主义的，所以在它反对政治反动派的斗争中支持它，并且決不在政治反动派反对反对派的市民阶级的斗争中支持政治反动派。应当注意这一点，因为伯恩施坦在他的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論战书（它深受资产阶级政党令人可疑的称頌和推荐）中，對我們发出了責难，重复歌根·李希特尔⁴⁹心爱的陈旧的謊話，說什么我們进行了直接有利于政治反动派的反对德国资产阶级的片面斗争，撇开和吓唬资产阶级，因而使惊惶失措的资产阶级躲到容克軍事警察国家的政治反动派的羽翼之下。这样的歪曲真理，是世所仅

見的。在60年代著名的“立宪冲突”时代，具有一定意义的社会主义政党还没有成立。1864年，当拉薩尔由于挨了瓦拉赫贵族拉科維茨⁵⁰的子弹而倒下的时候，全德工人联合会在整个德国的会员人数是五六千人，而且这是书面的記載，实际人数比这个数字还要少些。即使考虑到德国资产阶级的胆小如鼠，这一小群人也决不可能吓倒德国进步党。而且这一小群人投降了俾斯麦，在胜利地结束了1866年自相残杀的战争后授予他无上的权力，卑贱地屈服在他的政权的束縛下。硬說社会民主党在这里有罪，簡直是可笑的。誠然，拉薩尔很激烈地攻击过资产阶级，但是在这方面他在德国工人中間很少得到同情。虽然拉薩尔在自己反对进步党的斗争中，也許稍微过分地接近于俾斯麦的反动政策，但是不应当忘記，在立宪冲突开始时，他是站在进步党方面的，只是在进步党不顧他的坚决要求，頑固地拒絕了認真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才离开了进步党。

德国资产阶级(它的否則就难以理解的行為的謎底就在这里)在1862年也同在1848年甚至更早时期一样，沒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它害怕(关于这一点我在1863年直接当着进步党一位領袖的面說过)革命胜过害怕反动派。无耻地輕視別人并带有投机商人的狡猾性的俾斯麦，很快就了解了这一点。进步党員先生們“沒有使他敬畏”，他越对他們傲慢无礼，他就越容易把他們玩弄于掌股之上。

要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普魯士进步党背叛自由事业一事負責，这不仅是对历史真理的歪曲，而且证明完全不了解德国资产阶级从中世紀以来所起的作用。

我簡單地把两件事實作一对比。在立宪冲突时期，进步党势力正盛，但却輕易地被剛踏上自己仕途的俾斯麦战胜了。在反社会主义者法案⁵¹时期，俾斯麦势力正盛，并用一切适用于資本主义的手段实现资产阶级專政，他却輕易地被受到一切资产阶级政党

反对的社会民主党战胜了。这对我們表明了，在德国誰能够反对反动派，誰不能够反对反动派。

德国资产阶级的微不足道，毕竟沒有使我們在它坚决反对反动派的一切情況下推卸支持它的責任，——当然，这並沒有使我們本身的利益受到損失。从社会民主党作为政党出現在斗争舞台时起，它总是毫无例外地这样做的。至于說到我个人，那末只要提起这样一件事實，1865年我被驅逐出境，是因为阻止俾斯麦企图靠社会主义者的帮助消灭进步党，企图把它像夹在两个磨盘中間那样挤成粉末。我能够坦白地說，在自己反对俾斯麦反动派的整个斗争中，我在爭取资产阶级的自由。在我的經常被人引用的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立場的著作中，我闡述了我們运动的民主主义性质，这無論如何比最近伯恩施坦所作的更有說服力，伯恩施坦把我們已經花了整整三十年時間研究的东西作为最新智慧向我們推荐。

我应当对上面提到的我的关于策略的小册子說几句话。作为这本小册子的材料的演說，是我在1869年即在北德联盟时期发表的，这是一个临时情况的时期，这种临时情况不能是永久的，它不是在俾斯麦的整个大普魯士政策破灭的时候結束，就是在大普魯士政策由于南德各邦(除奥地利以外)的加入联盟而“完成”的时候結束。在这种过渡时期，事实的邏輯告訴我們無論如何要进行斗争。俾斯麦仿效拿破侖的榜样实行普遍的选举法，不是为了确立人民的主权，而是为了掩飾自己暴虐的专政。他认为，他能够在自己的地方长官的帮助下，任意地把普遍的选举法运用到这个或那个方面，正如拿破侖靠了地方长官的帮助所做的那样。在俾斯麦看来，普遍的选举法是比较加强市民阶级力量的三級选举制更为方便的统治武器，同时两次初选阶段变成了一种难以攻破的堡垒。

普魯士三級选举制的历史之所以富有意义，是因为它十分清楚地表明，由于经济的发展，甚至最古怪的和最狡猾的反动派的政

治制度是怎样改革的，这些制度怎样会渐渐变成自己的对立面。巧妙而狡猾地打算排除一切民主主义分子和反对派分子的这个选举制，在十年内最无可指责地执行了自己的任务，直到这样美妙的一天为止，那时候在经济上日益巩固的、被容克警察主宰的令人厌恶的放荡行为所激怒了的资产阶级，理会到了自己的政治力量，想到了下面这一点：它只要愿意，就能在两次初选阶段得到多数，从而在选举議員时获得胜利。这种想法变成了事实，而俾斯麦公爵咒罵这样可耻地欺騙了他的武器說：三級选举制现在成了“一切选举制中最可耻的选举制”，相反地，普遍的、平等的和直接的选举制，这个很好地证明自己在拿破仑法国十分有用的“瘋狂的 1848 年”的产儿，气焰万丈地宣布拯救专制制度的国家和社会。

于是，我們就得到了普遍选举法。但是，这还有别的原因。来自上层的王朝容克革命（它的最高点是俾斯麦的“民族”政策），如果不最低限度地赋予某种类似来自下层革命的东西，它就会悬在半空中了。人民是需要的，但是只能当个配角。比 1848 年普遍选举法更好的誘餌，是想不出的。普遍选举法在来自上层的俾斯麦革命和来自下层的 1848 年革命之間架上了一座桥梁，使缺少批判精神的群众产生了一种幻想，似乎靠了牺牲德意志而受到頌揚的容克警察軍人的普魯士，会实现民主派所梦想的那个德意志。我們现在知道，这种幻想的根扎得多么深，需要有十年最厉害的經濟混乱時間，才能把它們拔掉。

但是，俾斯麦有一件事失算了，他没有估計到革命思想的力量。六月事变以后（当时整个资产阶级投向最野蛮的反动派的怀抱）在法国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德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这里的政权不那么严格集中，这里靠资本主义的发展养育起来的健康的工人运动有了发展，这种工人运动所表现的勇敢和坚决，足以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利用民族危机和王朝斗争，足以把德国的社会主义

提高到能使它取得胜利和统治的决定性力量的程度。德国无产阶级具有这样的优点，它能够从在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方面都远远超过（现在也还超过）德国的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经验中，吸取对自己有实际利益的东西，而且还有一种无上的幸运降临到了德国无产阶级的身上：由于自己伟大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德国无产阶级从它最初登上政治舞台起，就站在政治斗争的基础上，这样它一方面没有犯闭塞的行会组织所具有的错误，另一方面没有迷惑于毫无目的和计划并且完全是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革命主义和革命空谈（Revolutionsmacherei und Revolutionsschreierei）。

在1867年，当普遍选举法刚开始实行的时候，德国工人阶级中虽然只有一小部分人具有阶级觉悟，但是它是唯一清楚地理解到选举的全部意义和选举法价值的阶级，而社会主义党是唯一清楚地理解到选举的全部意义和选举法价值的党。当时对选举法的评价甚至过高了些，但是这是有用的，因为可以增强力量。

俾斯麦公爵希望，他能够以拿破仑全民投票的精神利用普遍投票权，同时，我在1867年称之为“专制制度遮羞布”的国会却能依然存在，但自北德意志联盟变成德意志帝国以后，这种希望的政治基础已经消失了。俾斯麦政策的最大胜利，却酝酿着这个政策的崩溃和毁灭。普鲁士的丘八兵营警察精神，也许还能够在这段时间内，阻止北德联盟范围内的独立人民运动的发生和发展，但是要在德意志帝国扩大了领土上阻止这个运动，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人民的力量不允许自己被扼杀，而“同盟元首们”对普鲁士威力的羡慕，使得容克的俾斯麦专制制度之树，不能长得像拿破仑地方长官们的专制制度之树同样高大。任何诱饵都不能消除工人对社会主义同民主的不可分割性、民主同社会主义的不可分割性的认识。

我在1869年是这样开始自己的演说的：“对于社会民主党在

政治斗争中应该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如果我们弄清了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的话，就可以容易而自信地予以回答。社会主义和民主不是一个东西，但它们不过是同一个基本思想的不同表现，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从来不可能互相矛盾。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臆想的社会主义，正如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虚假的民主一样。民主的国家，是按社会主义原则组成的社会的唯一可能形式”。

这一个关于民主同社会主义的不可分割性的真理，成了德国工人阶级在最困难和最混乱的政治条件下的最可靠的行路指南，靠了这个真理的帮助，避开了最危险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暗礁，而普鲁士反动派还在40年代就把国家社会主义作为遵循的方向，因为当时已经存在着兵营警察国家的理想——兵营警察社会主义，它被好听地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瓦格纳—施韦泽的诡辩主义说，似乎民主是某种“资产阶级的东西”，而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主义，按照逻辑应当是不民主的东西，这种诡辩主义虽则在施韦泽时期引起了某些人的头脑混乱，但毕竟没有为工人群众所接受。现在这种已经过时的谬论在关于民警制的某些争论中又重新登上了舞台，但是它不能具有任何意义。

我们在讲下面的问题以前，应当弄清楚妥协一词的意义，否则一切的争论都完全是空洞的，没有结果的，因为每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了解这个词，因而其他人的论证对他来说都是不可理解的。如果把妥协理解成理论和实践的相一致，那我们整个生活和活动都成了妥协；人和人类的整个历史（从个人的生活开始，到人民和整个人类的生活为止）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妥协的一条不间断的锁链。有一种历史概念认为，可以而且应当把每一个历史时期看成是 *tabula rasa*，即看成是一个不受任何过去的东西妨碍的、实行新经济形势和新制度的活动场所，这种概念是非常不科学

的，同經驗发生了最尖銳的矛盾。“tabula rasa”理論現在像幽灵一样，只在一些警察政治家的头脑中还隱隱出現，他們断定說，我們打算“破坏一切”對我們不合适的东西。这些先生該判断一下自己，因为正是他們以为自己具有产生奇效的力量，能够“破坏”永久的織布工——時間在自己的車床上已經創造和正在創造（而且沒有征求警察局的同意）的一切。起草反社会主义者法和苦役法⁵²的先生們以自己愚蠢的心机，暴露了自己絕頂的无知。支配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法，不能任意加以改变或宣告无效，正像不能改变动植物的生长和发展規律一样。誰要是强制地侵犯它們，誰就只能起阻碍和破坏作用，这老早就**是警察政客們的命运**。这些自命为“治国之才”的小人物，說我們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創造只能破坏，这只是他們本身活动方式的反映。在他們指責我們的无数过錯和罪惡中，沒有一件不是从他們自己身上借用来的。我要在旧例子中加上新例子，再举出一个近二十年来成了常例的責难，人們責难社会民主党抱有无产階級专政的目的。事实是，实际上从巴黎六月事变以来，即在五十一年中，在整个欧洲大陆实行了真正的资产階級专政。这个专政以火和劍猛烈攻击工人階級，在六月事变后，卑鄙地屠杀我們和开天公社，对工人組織了上百次比較小規模的杀戮；这个专政力图剝夺工人階級的一切权利，因为它不仅不許无产階級享用政治权，而且不許它享用法权；这个专政在各种各样的特別法和限制法中大显身手，这个专政使我們德国人得到了反社会主义者法、苦役法和階級司法的判決（例如对列勃杜威尔的判決或者关于破坏誓言的埃森訴訟）。如果“施杜姆国王”⁵³（它是目前“社会改革”王国中的“国王”）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即消灭一切工人組織，那末同瑪丽亚和苏拉的专政相比，或者同1792年到1794年的法国“国民議會”的专政相比，这样的专政又成了什么呢？社会民主党（不管它的敌人做些什么）所力求取得并为之而斗争的政权，其

目的不是获得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消灭资产阶级专政。同样地，无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只是防御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武器。无产阶级这个斗争的胜利结束，意味着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的终止。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知道，把支配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那些法律加以改变或宣告无效，不取决于我们，也不取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些执政者。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力量立刻随自己心意进行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组织，正像九年前德国皇帝没有力量实行自己的二月法令⁵⁴反对为资本主义而进行阶级斗争的那些人一样。因此，我们能够带着冷笑和冷淡的态度，来看待我们敌人想强制地扼杀工人运动的一切企图，我们过去和现在对自己的成就如同对解算题一样，总是满怀信心。但是我们同样知道，各种关系的改造是一个有机的过程，进行时虽然是不间断的，却是顺序渐进的，不破坏现存的东西的；消灭衰亡的东西不是破坏，而破坏现存的、有生命力的东西，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从法国革命的例子中对这一点看得特别清楚，这个革命的进行是一切政治变革中最有计划性的，最有毅力的，但是经历了黑暗中的思想彷徨和虚无缥缈的幻想的“黄金时代”以后，不得不面对现实，把新的东西同旧的东西联系起来。在初次攻击的时候，有时会消除还有生命力的东西，但是历史教导我们，甚至最革命的和最专制的政府，按照事物的逻辑最后不得不向后转，不得不承认（虽则以另一种形式）那些被错误地、机械地消除了的东西。简短地说，历史上存在的现实，照例是过去和将来妥协的结果。

因此，在这个词义上反对妥协，就是理论上的蠢事。如果一个政党拒绝从政治生活的有利的行情中（请原谅我用这种买卖人的语言）为自己取得好处，不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利用各种政党的斗争，那就是实践上的愚蠢。简单的生活智慧要求这样做，这和原则

毫不相干，因為我們不承擔任何義務，不做理智指點我們做的事情，就是昏庸。如果我們社會民主黨人有時在國會中，對某些社會政治問題同保守派一道投票贊成政府，而在另一種情況下，對政治和貿易問題却同自由主義者一道投票反對政府，那末這是一種政治鬥爭的合理要求，雖則這無疑是理論和實踐之間的妥協，但是這同黨屢次尖銳地和堅決地反對的那種妥協毫無共同之點。黨指的是通過正式決議規定全體黨員有責任避免訂立協議、協定、同盟，或者換句話說，避免一切迫使犧牲原則或一般地以不利於我們的形式改變我們黨對資產階級政黨的關係。

對後一點應當特別注意，因為這是問題的本質。比如，在關於參加普魯士議會選舉的爭論時，問題就僅僅涉及這一點，因為在贊成參加選舉的同志中間，沒有人想在同進步黨訂立協議時犧牲黨的原則，雖則不應當忽視策略問題會非常容易變成原則問題。如果條件和必要性有時迫使我們同其他黨派聯合行動，那就永遠應當在不妥協的情況下這樣做。我舉比利時為例。在那裡，無論是自由黨，或者是社會黨，在反對教權主義黨的鬥爭中，利害關係是一致的。兩個黨協調了自己的行動，在某種程度上一起行進。這本來可以不訂立協定的。然而實際上却訂立了協定、協議。結果怎麼樣呢？結果是喋喋不休的爭論。協定看來是完全多餘的。共同的利益一消失，共同的行動也就馬上結束，而在此以前，這種共同的利益甚至在不訂立協定的條件下推進了共同行動。如果說工人的階級意識有時不十分強烈，那末資產者老爺的階級意識却無疑是十分強烈的，他們的階級本能大大強於工人。這種情況同樣適用於那些擁有民主法律和民主機關的國家。我可以指出瑞士資產階級民主派和社會主義者之間的決裂。瑞士是伯恩施坦所說的Эльдорадо^①，按照他的理論，那裡階級對抗本來應當是完全消失

① Эльдорадо 的意思是理想國。——俄譯者注

了的，但是据我們知道，那里的阶级对抗同不那么民主的国家一样，在有力地进行着。但是，我們并不因此就否认，由于有了民主机关，阶级斗争的尖锐程度在缓和。

在比利时，一方面有自由的机关，另一方面却有僧侣政府，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政党訂立的选举协议，至今为自己找到了有利的基地。在这里，至少我們的党在它訂立的一切协议中取得了好处，起了领导作用。它既不会受利用，也不会受欺騙。尽管如此，我們的比利时同志們认为妥协是不合心意的，王德威尔得⁵⁵同志在“維也納工人报”⁵⁶上把比利时实行比例代表制当作“結束选举协议”来祝賀。他写道：“在阶级斗争中，次要因素现在不再起作用了，带来混乱的附属情况将会消失，因为这些情况十分有力地阻碍群众去了解阶级斗争的真象。”因此王德威尔得认为，即使在最有利于工人的条件和关系下实行妥协，妥协仍然是“阻碍群众去真正了解阶级斗争”的有害行动，換句話說，妥协会离开阶级斗争的基础，夺去工人充分发挥自己力量和在行动中考驗自己力量的可能性，因为这只有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能达到。

妥协的危險的和有害的影响不在于形式上的让步，或者忽視党的原則。我們党内未必有人曾經会想这样做。甚至在埃森倒数第二級的选举中，我們的同志“怀有恶意地”投票重选“大炮大王”的当儿，也絲毫沒有想到牺牲我們的綱領。危險和要害不在这里，而在放棄阶级斗争的原則，把它放到次要地位，或者把它忘記了，因为这个原則是整个现代工人运动的出发点。这是必須清楚地加以識別的，不要把自己沉醉在响亮的詞句中（簡短地說，应当拋棄空談），十年以前，我在談到假革命的、实际上是庸夫俗子和反动的“无政府主义”空話时，在談到这种资产阶级自由理想和小店主自由竞争的化装舞会的落后諷刺画时，就讲过这样的話。

同情貧困，幻想平等和自由，意識到社会的不公平并想消除这

种不公平——所有这些都不是社会主义。我們在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中看到的指責財富和尊重貧窮，這不是社会主义。在私有制發生前占統治地位的、一切時代和人民的幻想家以為是最終目的的原初共產主義，也不是社会主义。巴貝夫主義者（巴貝夫的学生們，即所謂的 *egalitaires*——平等論者）強制規定的平等，也不是社会主义。

所有這些現象，都缺乏資本主義社會及其階級矛盾的真實基礎。現代社会主义是資本主義社會及其階級矛盾的產兒。沒有它們就沒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倫理學，這是兩種不同的東西。這是必須深刻理解的。

誰要是從溫情地、博愛地追求平等的意義上來了解社会主义，而沒有資本主義社會實質的概念，他就根本不是階級鬥爭意義上的社会主义者，因為沒有階級鬥爭，現代社会主义是不能想像的。當然，伯恩施坦在口頭上也贊同階級鬥爭，正像黑森的農民贊同“共和國和大公爵”一樣。誰能夠徹底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實質和了解現代社会主义的基礎，他也就懂得，離開階級鬥爭基礎的社会主义運動可以成為任何東西，但就是不能成為社会主义運動。

馬克思對現代工人運動所規定的這個階級鬥爭的基本真理（他的不朽的功績也就在這裡），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反對社会主义時所進行的一切攻擊的主要對象。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否認階級鬥爭，想把工人運動變成資產階級政黨運動的一部分，想把社會民主黨變成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一個派別。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和政策，竭力反對現代工人運動的階級性。如果它們能夠把這個社會民主黨的堡壘，把這個社會民主黨的大本營打開一個缺口，那社會民主黨就會失敗，無產階級就會受資本主義社會的支配。就算起初這只是一個不大的裂縫，但敵人有可能把它擴大，並且它具有徹底勝利的信心。而當敵人作為朋友走近堡壘，作為朋友鑽進

堡垒的时候，这种敌人是最危险的。作为朋友和同盟者（Bundesgenosse）的敌人，是最危险的敌人。

对公开反对我们的敌人，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给予回击，很容易把他打倒。警察政客的愚蠢而残酷的暴行，反社会主义者法、苦役法和反对政党宣传革命的法律⁵⁷等的迫害，只会在我们中间引起鄙视，但是对那些自称是我们的朋友和兄弟，向我们伸出手来订立选举协议和骗取我们信任的敌人，对这种敌人，而且仅仅对这种敌人，我们是应当害怕的。

我们的堡垒在任何攻击下依旧巍然屹立，不论是袭击，也不论是包围，它是攻不下的，是不能从我们这里夺走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为敌人大开方便之门，并把他们作为同盟者吸收到我们的队伍里来，那堡垒是会陷落的。对我们这个从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党来说，阶级斗争是党生存的条件。有了阶级斗争，并且由于阶级斗争，党才是不可战胜的，没有阶级斗争，党就要灭亡，因为党的力量的源泉毁灭了。谁要是轻视这一点，认为阶级斗争的观点经不起批评和阶级矛盾似乎在逐渐缓和，他就是站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上。

人们把现在关于参加普鲁士议会选举等问题的策略争论，同80年代在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内部发生的关于德意志航运业补助金的争论作了比较。表面看来，这种比较是很合适的，但这只是在我们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以前的看法。当时问题涉及到把公认的基本原则运用到具体情况中去。社会民主党党团应当鼓励德意志航运业和贸易的利益，这和他应当反对殖民政策和其他帝国主义反动勒索一样，同为公认的事实。争论只涉及这样一个问题：航运业的补助金是否真正首先符合作为民族利益的德意志贸易的利益，

还是德意志貿易只适合于殖民政策，而殖民政策不服务于德意志的民族利益，只服务于反动的和对社会有害的私人利益。当时任何人也不想原先的党的策略和党的方向中改变什么东西。而在目前的爭論中，問題涉及到完全改变原先的策略和方向，而这种改变策略意味着改变党的实质。問題在于我們仍然站在階級斗争的立場上，还是放棄使我們不同于所有資產階級政党的階級斗争观点，簡短地說，問題涉及到了一个决定性的步驟，这个步驟关系到我們是否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党，还是我們轉为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左翼。

在理論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对党并不危險。在我們看来，批評不受任何限制，而且不管我們對我們党的奠基者和最初的領袖多么尊敬，我們不知道有什么絕對正确的事情，我們除了科学的权威外，也不知道有什么其他的权威，而科学的范围是在經常扩大，它能指出直到现在被认为是真理的錯誤，它破坏陈腐的基础和建立新的基础，因为科学一分钟也不会在地面不动，它在自己不停的前进运动中，无情地扔去陈旧的教条信仰。远在二十四年前的哥达联合大会上我就說过：“我們不承认任何沒有錯誤的和紙上的权威。”

而1891年在爱尔福特，我解釋了和捍卫了后来被一致通过的新的綱領草案。我指出，我們的綱領正由于自己的科学性，正由于科学的不断前进，当我们剛通过它时，有几条条文就馬上显得落后了。在每一个懂得科学是什么的人看来，沒有一个人（即使是大智大慧的馬克思也同其他任何人一样）能够对科学作出最后的結論，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都无权譴責对馬克思学說的理論攻击，也无权因为这点而开除某人的党籍。如果这种理論攻击搞到推翻我們整个世界观的基础，比如像伯恩施坦所做的那样，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在这种情况下，必須給予严厉回击。

但是，放棄我們的实践原則，比理論攻击要危險得多。至于理

論上的爭論，慎密地涉及它實質的只是我們為數較少的黨員同志；相反地，放棄實踐原則，策略上違反黨的綱領會涉及每個黨員同志，會引起每個黨員同志的注意，如果不立刻很快地糾正它們，就會引起全黨的混亂。我認為，凡是熟悉情況和了解我們黨的人，在我說到伯恩斯坦的一大堆“論戰書”在黨內只引起很少注意時，未必有人會反駁我。這堆書只在早先已經持有這種觀點的人中間得到反應；只是在我們敵人中間引起重視，因為他們在這堆書里看到了可以實現自己的宿願；黨可能分裂，或者整個社會民主黨甚至在音樂和鼓聲的伴奏下轉到資產階級陣營去。我敢打賭，在我們同志中間，讀過伯恩斯坦的書的人連一千個也找不出，同時我決不因為黨沒有重新清除雜草的願望，又同那種垃圾（社會主義的奠基者們為了給通向社會主義打開道路，早在幾乎兩代前就扔掉這種垃圾了）打交道而責備黨。否則，也同樣可以因為我們的同志沒有讀過較多的舒爾采—德里奇⁵⁸不合時宜的文章（這些文章成了滿蒙塵土的滯銷貨，散落在某些外省小城里），而責備他們缺乏對科學研究的愛好。

看一看對伯恩斯坦的書作過論述的人的名單，你們找不出一個工人來。所有讀過和就伯恩斯坦的著作發表意見的同志，只是由於自己的職業或才這樣做的。相反地，整個黨對參加普魯士議會選舉或者巴伐利亞政治協議這種問題却多么關心，這些問題又引起了多么熱烈的爭論！在這種密切的關心中表現出黨的成熟。在我們看來，理論的、綱領的爭論的時間已經過去了。我們敢於把巩固、改進、精煉我們綱領的工作，托付給這樣一種科學去完成，這種科學在現代社會中可能只是少數人的事情。但是，綱領的實際應用，黨的策略是大家的事情；大家都要參加這件工作。

我們黨一開始就清楚地意識到策略的十分重要，意識到必須保持它的階級鬥爭的性質。讀一讀過去 70 年代歷次代表大會的

记录，你们就会发现在决定一切策略问题时，这样的思想占着首要地位：必须保持党的全部纯洁性，不允許把它同其他政党混淆起来；因为对这一切政党来说，尽管它们各有特色，尽管它们互相敌对，它们的共同基础却都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社会民主党这种不同于其他一切政党的独特性，这种本质上的区别（我们愚蠢的敌人在这种区别中寻找宣布我们不受法律保护借口，或者寻找在政治上诅咒我们的依据）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力量。

还在汉堡代表大会上，当时在一系列混乱情况的影响下，许多代表似乎已经决定同原先的策略和传统决裂，在即将堕入深渊的最紧要关头，代表大会醒悟过来了，绝大多数反对任何妥协。这一决定直到现在还仍然有效。如果两三个选区认为同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Kartellverhältnis）是合适的，它们也只是由于自己本身的责任而这样做，而这种做法无疑是和汉堡决议相违背的。必须再重复一遍，汉堡决议并没有因斯图加特决议而撤消。相反地，被妥协的捍卫者诬蔑为破坏汉堡决议的柏林党员同志们，忠诚地遵循了这个决议的精神和正确的思想，用自己坚毅不拔的精神维护了党的最高机关的威信，为党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妥协策略的捍卫者在大多数情况下过高地估计了议会活动和议会席位的意义。这决不是说我们否认议会活动的巨大好处，但是议会活动毕竟不是目的，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我们力量的表现不在于议席的数量，而在于拥护我们的那些选民人数。

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的私有欲会过高地估计占有议席这件事情；在议席中，也像在金钱中一样，包含着权力——高于一切的权力。但是，对把我们党的纯洁性和伟大看作高于一切的人来说，议会的价值只不过是帮助显示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和发展。如果由于获得议席，我们的徽章、我们的盾牌失去了自己的光辉，就是有十个一百个议席又值得什么呢？议席的价值本身是渺小的。

但是我們党的純洁性的价值却是不可估量的。我們的力量就表现在純洁性上。

作为男子光荣标志的头发被剃去以后，參孙^①的力量就消失了，如果我們允許资产阶级的达尔利亚誘騙去我們最好的飾物，誘騙去我們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源泉：党的純洁性，党的光荣；我們党的力量也要消失。

我們不能像其他政党一样行动，因为我們不同于其他政党。我們同其他一切政党隔了一堵坚固的墙（重复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是多余的），这堵墙当然每个人都可以越过去，但是一越过这堵墙，他就不再成为社会民主党員了。

“我們不同于其他政党”；那些对其他政党来说是生存所必需的东西、生存的条件，对我們来说则是死亡。是什么使我們在德国变成了按其作用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党，这个党正在形成为（像喀普里維⁵⁹所正确指出的和日常經驗所教导的那样）政府政策以它为轉移的軸心呢？这决不是因为我們在国会中的議席。我們能够把議席再增加三四倍，但这毕竟不能在资产阶级政党联合陣营中引起惊恐。是由于自然的規律性，或者正确些说是由于自然的力量，拥护我們的人大量增加，使我們变成了这样一个政党。拥护我們的人越来越多，他們的数目逐日增加，从几万增到几十万，又从几十万增到几百万，这引起了我們敌人的恐惧和无可奈何的狂怒。而这种人数的大量增加，是我們同其他一切政党相对抗的结果，是我們同其他一切政党斗争的结果。每一个貧困的和担負力所不及的劳动的人，一切受到現代资产阶级社会不公平和暴力压迫的人，一切人类尊严受到損害的人，都满怀希望地关注着我們，

^① 古犹太神話中的英雄，所向无敌，后被达尔利亚探出秘密，知道他的力量在那七鬃头发里面。敌人利用机会剃去他的头发以后，參孙就被敌人所擒。——譯者注

把我們当做唯一能帶給他們生路和解放的政党。如果我們，这个充滿着不公平和暴力世界的敌人，突然向这个世界兄弟般地伸出了手，同它的代表者訂立同盟，迫使我們的同志同他們的敌人（正由于这些人的罪恶而使群众倒向我们阵营）携手并进，这在思想上会引起多大的混乱！这样，群众怎么能信任我們呢？如果中派、进步党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成员成为我們的同盟者，那末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它的代表者和捍卫者就是这些党的全部成员）的斗争又是为了什么呢？那末，我們又有什么一般的生存权利呢？这至少对在我們旗帜下寻求生路的几十万几百万的人来说，他們靠近我們就是大錯誤了。如果我們同其他人沒有絲毫的不同，那就是說我們并不是人們所认为的那种人，那末还应当出現真正的拯救者。这就是說，社会民主党原来也是一个虛假的救世主，絲毫不比其他口是心非的騙子手強些！

我們的力量正在于我們不和其他人一样，正在于我們不仅不同于其他人，而且是他們的死敌，发誓以冲击占領和彻底消灭資本主义的巴士底監獄；而其他一些人却正是巴士底監獄的保卫者。因此，只有当我們獨立存在的时候，我們才是有力量的。

我并不想因此說，我們应当与世隔絕，把自己孤立起来。只要斗争在延續，我們过去和将来都不缺少同伴。自社会民主党从理論轉入实践以来，它就不承认“統一的反动群众”这些話，因为它们虽然基本上是真实的，但是如果从字面上去理解这些話，那它們是虛假的。我們知道，这种“統一的反动群众”的个别成员或个别派别是彼此仇視的，而我們經常利用这种仇視来达到我們的目的。我們利用一个敌人来作为反对另一个敌人的手段，从来不使自己受别人利用。我們反对容克俾斯麦所体现的资本主义和軍国主义，而俾斯麦的一切资本主义敌人都被我們利用来削弱俾斯麦，不管这个敌人是分立主义还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但是这不是妥协，甚

至也不是“訂立暫時的協議”(Augenblickskartelle)，這同我們在國會中投票贊成進步黨反對容克的提案時的情況，也沒有任何相似之處。

這種對待其他政黨的態度的特殊情況，對德國社會民主黨所以必要，是由德國的歷史發展，特別是由我國的政治條件造成的，因為我們不像法國和比利時那樣，有暫時可同他們一致行動的革命資產階級；我們沒有允許社會民主黨人同某個其他政黨的代表一起在政府中出席會議的民主機關。在瑞士，政府幾乎只是起着由人民選舉出來的管理機關的作用。在那里，社會民主黨在聯邦政府的作用，同社會民主黨在眾議院中的作用一樣。因此在瑞士，我們的同志們能夠毫不动摇地捍衛糧食和燒酒的壟斷，因為他們用不着耽心像在德國可能發生的那樣，會把通過這種方式得到的資金花費到敵視人民和反對社會的用途上去。

甚至在法國，情況也和我們有所不同。雖則在那里，政府無疑是一個階級的政府，是一個階級鬥爭的政府，同某個其他國家相比有時甚至在更大程度上表現出是這樣一個政府，然而由於情況的不穩定，民主的影響，以及社會民主黨的強大，即使較長期地濫用政府權力於反動的和反社會的目的也是不可能的。正因為如此，在若干年前社會主義者饒勒斯⁶⁰能夠向法國議會提出關於糧食貿易的提案，這個提案表面上同大地主卡尼茨侯爵向德國國會提出的糧食壟斷提案很少區別。但是內在的區別卻十分深刻，因為在法國沒有容克，由資產階級直接進行統治，同時卻存在着這樣一些條件，這些條件使資產階級不可能把統治的手段（警察、軍國制度、階級司法制度等）用於國家的目的，而這些在德國，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實際上是存在的。這裡又像往常一樣，在資產階級發展的歷史時期落在德國身上的悲慘命運折磨着我們。雖然我們有最壞的資本主義階級國家，然而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只能間接地進行統治，它

不得不耐心地忍受这样一个事实：純粹天主教的僧侶政党——中派，是德国人民代表机关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政党，普魯士容克（这种旧时代的殘余，这种落后的階級無論在政治生活或在經濟生活中都沒有起到任何必要的作用，并且过着純粹的寄生虫生活）却能掌握着統治国家的壟斷权。这种情况所产生的后果，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得不領導爭取資產階級自由的斗争，因此，德国工人階級担当了这样的任务：把爭取政治解放的斗争同爭取社会解放的斗争結合起来，或者換句話說，他除了自己的階級任务以外，不得不完成在正常发展的国家中早已由資產階級完成的事情。

一切政党都把我們当作一种政治力量，这种看法是符合我們的力量的。甚至不承認我們有生存权利的最橫暴的反动派也力求取得我們的欢心，用自己的行动来揭露自己反对我們的言論的虛偽性。从其他党派寻求同我們“联合”（Bundesgenossenschaft）这件事事实出发，某些同志得出奇怪的結論說，似乎我們应当改变党的策略，用訂立协定、选举協議、妥协等的“现实”政策（Geschäftspolitik），来代替同其他一切党派进行階級斗争的旧政策。有这种想法的人竟忘記了，迫使甚至是我們最凶惡的敌人寻求同我們联合的那种力量，要是沒有我們的階級斗争的旧策略，它就根本不存在了。如果馬克思、恩格斯、拉薩尔遵循了同各資產階級政党妥协和接近的策略，那根本就沒有什么社会民主党，那我們就成了进步党的尾巴。如果說，我們从策略观点出发利用各資產階級政党之間所发生的紛爭，那这是可以不讲自明的。这从社会民主党存在的时候起就开始实行了，而且在这方面我們向来不需要党的初出茅庐的大政治家的忠告。如果我們在个别情况下需要同中派或进步党共同反对反动的执政党，那我們的同志們不需我們党进行特別的解釋就

可以明白这一点的。而在各个选区里，我們不訂立选举協議而同中派一起行动，所获得的成績大于最近巴伐利亚“交易”时期的成績。对一个人來說是好事情，对另一个人來說却是不应当做的事情。我們社会民主党人不可能同其他政党一样，因为他們在現代社会的不公平方面毫无例外都是有罪的，都要对这种不公平承担责任。受到这种不公平迫害的每个人，都把我們当作是自己的救星。我們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現代社会的牺牲品在法院、在政府那里、在皇帝那里、在其他一切政党那里都沒有找到自己权利的捍卫者，他們把我們当作最后的也是唯一的能够給他們帮助的人来靠近我們。他們不了解我們科学的綱領，他們不了解什么是資本和資本主义，但是他們對我們怀着尊敬，他們感到，我們是在其他一切政党拒絕給予帮助的地方却給予帮助的政党。这种信任是力量取之不竭的源泉。这是这样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任，这种信任曾經在土崩瓦解的羅馬帝国日益发展，冲击了羅馬帝国和整个異教世界，最后推翻了它們。當我們同其他政党訂立協定，說什么“我們同其他人之間沒有本质的区别”，我們就要失去这种取之不竭的源泉，我們就会使一切受苦难的人离开自己。只要有一次抹去階級对立的界限，只要有一次进入妥协的斜坡，那要停止就已經不可能了。那我們就会越跌越下，直到完全墮落。我們在国会中得到了很有教益的經驗。实际政策迫使我們去适应我們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的制度；但是在适应現代社会制度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對我們來說都是艰难的一步，我們只是躊躇再三才決定走一步的。这就引起各方面不少的嘲笑。然而，害怕走上这种斜坡的人，同那种允許自己嘲笑这种謹慎小心的人相比，至少是更可靠、更值得信賴的同志。空談“革命”当然是可笑的。在每个場合重复“革命”、“革命的”詞句是可笑的，——关于这一点沒有一个人比我自己讲得更清楚的了。这会变成毫无意义的机械的重复，好像嘵嘵叨叨的禱告

或者好像数念佛珠。如果不管在方便和不方便的场合下都夸耀地显示自己对党的信念和属于党，而且没有必要地强调这一点是可笑的，那末这种极端并不能证明我们因噎废食是正确的，我们根本不当一般地宣称任何强调我们党的革命本质的行为都是可笑的。恰恰相反，强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事情。这所以重要和严重，是因为作为社会民主党党员，就意味着进行会带来残暴的迫害的政治斗争，就意味着进行私人的、个人的斗争——争取生存的斗争，而后一种斗争对多数人来说比政治斗争更加困难更加严重。这所以是必要的事情，是因为进行这双重斗争的勇气，只能从下面这种意识中去汲取，即意识到正在压迫、摧残绝大多数人，并把他们导向死亡的社会的不公平，只有通过革命行动，也就是一定会消灭主要祸害——资本主义及其一切根源——和根除其斤斤计较精神的行动，才能消除。

我知道，现在对于发出在斜坡上防止堕落的警告的嘲笑，成了时髦事情。同时，人们都想起了狼和牧童的寓言。但是这种比拟有很大的缺陷，并且立刻驳斥了寓言的作者。狼最后是真的跑来了的，并且闯进了畜群。我们的情况也是一样，人们警告的那种危险决不是一种想像。至少谨慎小心的人，比嘲弄者更好地捍卫了党的利益。不信任直到现在被认为是民主的美德，而过分的轻信则被认为是民主的缺陷。看来，现在有人想遵循相反的观点。

无产阶级在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都同阶级国家有尖锐的矛盾，它不得不在一切方面，在内政和外交的一切问题上同阶级国家进行斗争。

当然，正确的路线并不总是很容易找到的。在利益不是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地方，感觉很容易让自己欺骗了自己。幸好

难于立刻决定采取怎么样的策略的情况下，我們敌人的行为和立場能够作为我們可靠的、正确的指南針。常常有这样一些問題，我們对它們可以暂时同敌人取得一致意見，但是，我們的敌人作为重要的或者甚至是迫切的問題来捍卫的事情，能够成为无产階級政党的事情，那是完全不能想像的。因此，如果我們做違反我們敌人利益的事情，那我們是永远不会犯錯誤的，反之，如果我們做我們敌人同意的事情，那我們的行动几乎永远不会是正确的。历史的发展是不断的斗争——利益斗争，民族斗争，階級斗争。既然經濟事务中的寬宏大量也被认为是不合适的，那末斗争中的寬宏大量就更不合适了。政治上的寬宏大量和多愁善感是一种禍害。它們决不能获得胜利，只能遭到无数次的失败。布呂歇尔的“向敌人进军！”的格言，在政治斗争中也是最好的格言。

我就这一方面再讲几句话。资产阶级的階級本能比无产阶级的階級本能成熟得多。統治階級当然比被統治階級更了解自己的利益，而被統治階級由于自己的地位不大可能理解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統治階級不断地、有意无意地妨碍它理解自己的利益。

且不說什么社会主义常常表现出来的十分粗暴的形式，是资产阶级惊恐和发怒的原因。这无疑是错误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形式，而是社会主义的内容使资产阶级厌恶，越是不讨厌的形式，在资产者先生們看来，它的内容在大多数情况下越是危險。在他們看来，形式的精巧与否，沒有多大意义，因为关于这个问题，可以用他們自己进行斗争时所采取的方式来进行判断。

不管怎样謾罵，不管編造什么样的关于“台尔克木棍”⁶¹的有名寓言。实际上，“台尔克木棍”从来也沒有触动过一个人。木棍策略在德国实行了几十年，直到現在也还没有完全取消。但是，认为木棍是最不可反駁的论证(ultima ratio)的那些人，恰恰不是工人，也不是社会主义者。这种策略只属于“民族的高貴代表”，只屬

于民族自由主义者，他們企图用討伐营、行刑队（Hurrah brüllenden Knüppelbataillonen）的組織、粗暴的恐怖手段来保证自己的政治統治（特別在德国中部和德国西南部）；而这种恐怖手段，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日益发展的社会民主党消除了。

無論如何不应当忘記，問題一經涉及到我們的資產階級敵人的階級利益，那他們的政治本能就会迫使他們對我們采取敵對的立場。比利时是一个典型例子，正如已經談过的，在那里，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主义者在可以想像的最順利的条件下进行了妥协。我們党在比利时无疑是領導者，因而它并不耽心在整个胜利果实方面会受到欺騙。它的目的是实行普遍的、平等的和直接的选举权。但是教会党了解，它是在同誰打交道。它知道，給予工人普遍选举权，根本不符合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因为工人在現代工业国家中占居民的大多数，这样就保证他們可能获得多数和統治。因此，教权派提議附有多数投票权的比例代表制（也就是使富人可能多得几票），答应急进資產階級如果在反对普遍的、直接的和平等的选举权斗争中支持他們，就保证急进資產階級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結果怎样呢？急进資產階級先生們不經片刻的考虑，就撕毀了自己同社会主义者訂立的协定，現在同教权派一起反对普遍的选举权和反对社会民主党。

如果一个人，連这个例子都不能教会他懂得无产階級的解放斗争是階級斗争，他就是完全不可教药了，要說服他，就是白白浪費時間。沒有一个資產階級政党，社会民主党可以指望得到它的可靠的支持。我們能够在来自各資產階級政党的政治斗争轉变中获得的各種支持（如果我們明智地行动），应当對我們不附加妥协。各政党間的妥协和选举協議，正同国家間的协定一样，当各該政党的利益需要这些妥协和选举協議的时候，它們是被切实遵守的。但是，只有在利益是事物主宰的地方，只有在不需要妥协、选举协

議和協定的地方。我們來研究這樣的具体情况，比如獲得六個新的議會議席對我們巴伐利亞的黨具有重大意義，然而就我們黨的力量和影響來說，我們能夠不進行政治妥協而找到獲得這些議席的途徑和手段。在任何情況下（更不用說原則問題了），加強中派是嚴重的策略錯誤。這所以特別是嚴重的錯誤，因為這種錯誤阻礙中派本身內部發生的瓦解過程。在工人還處在中派影響下，還沒有浸透階級意識，還沒有學會把自己的階級利益置于宗教利益之上以前（過程是隨着自然必然性進行的，因為它取決於本身的經濟發展條件，我們能夠用我們的宣傳加速這個過程），中派的地位是牢固的。在奧芬巴赫斯克和其他選區里，我們的工作做得很好，大多數的天主教工人在最近的選舉中投我們的票，而不投自己黨的候選人的票。

階級鬥爭的策略同妥協策略相比，不僅在原則上是比較正確的，而且能產生比較有效的作用，獲得較大成果。

被擁護巴伐利亞妥協的人提到首位的有效觀點，當然是很……有效的，但是除了有效以外，還存在着其他因素，這些因素也必須加以重視。原則的純潔性，我們意願的理想主義，這些因素使我們能以最巨大的力量鞏固我們的隊伍和吸引擁護者，給我們以力量來進行我們整個的鬥爭，給我們的學說以力量來無可抗拒地把一切感到受壓迫和具有人類尊嚴的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毫無疑問，同中派訂立協議是很有效的，它給了我們半打議會議席，但是你們難道不記得瑪甘洵的話么：

我常常大膽責備：
窮姑娘怎能犯罪！
我把罪行罵得最嚴厲，
簡直找不到恰當的言語。

不管罪行多么污黑，
我要把它抹得更黑！
我常常这样骄傲和自尊，
现在也掉进犯罪的泥坑！

是啊，我們怎么能常常这样大胆地斥責“政治商販”，特别是“黑帮”^①商販呢！我們甚至把黑暗的东西和黑帮塗黑了。而現在怎么样呢？我們不能做我們敌人所做的一切事情。我們不能为了利益而牺牲一切。對我們敌人是有利的东西，對我們却是致命的毒药。貴族們說自己是“Noblesse oblige”^②；我們說是“Socialisme oblige”（“社会主义負有責任”）。

如果說，策略指示（或者只是准許）人們同敌人进行联合，以便靠“临时協議”来取得片刻的胜利，那末舒馬赫^②在佐林根的机会主义活动，就是一个优秀的策略家的活动了，当时（去年）他在国会选举中同进步黨員結成了联盟，以便把党从……我們这里挽救出去。他决沒有变成资产者（上帝保佑），他只是利用了资产阶级的帮助来打倒我們这些伪社会主义者，使真正的社会主义得以胜利，正像米勒兰想依靠同加里腓和瓦尔德克—卢骚的联盟来消灭蹟武主义一样。無論是舒馬赫，或者是米勒兰，都能引用同样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行为作辯护。我們則把这种行为称做叛党。

随着社会民主党的发展，随着它向一直是其他政党統治的那些地区的渗透，随着我們实际活动的扩展，我們同其他政党的暂时联系或者关系（Augenblicks-Verbindungen oder Augenblicks-Verhältnisse）越来越多。但是，这种临时关系决不当变成临时協議（Augenblickskartellen）；作为一个政党，我們决不能使自己受

① “黑帮”在德國是歌呼中派的。

② 地位負有責任（法文）。

契約的約束。我們应当永遠遵循行動自由的政策，利用局勢，迫使敵人為我們工作，而為了不斷地追求黨的最終目的，永遠只循自己本身的道路前進，只在我們的道路同別人的道路偶然巧合的時候，才同其他黨派共同行動。但是我們一分鐘也不應當忘記，我們是階級鬥爭的黨，它同其他一切政黨沒有任何共同之點，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它應當進行鬥爭並戰勝其他一切政黨。

我根據法國同志的要求，就米勒蘭事件和黨的統一問題，給法國工黨（“馬克思主義者”）⁶³在厄彼爾奈舉行的最近一次年會寫了下面這封信。

朋友們！

你們知道，我認為不干涉其他國家社會主義者的事務是我的天職。但是，由於你們想聽取我對你們代表大會及整個工人的和社會主義的法國所關注的那些迫切問題的意見，也由於有些社會主義者，即對這個問題與你們持有不同觀點的你們的同胞也想聽取我的意見，我就沒有任何理由不發表自己的意見了；更何況你們現在在法國所處的境況，實質上同我們德國人所處的境況沒有什麼不同。

社會主義的國際性質是日益為人所知的一個事實，是日益具有重大意義的一個事實。我們社會主義者是一種特殊的民族，是在世界各國同一種的國際民族。而資本家及其走狗（這種資本家手中的工具）和受騙的莽漢（dupes）同樣是一種國際民族，因此我們實際上可以這樣說：現在在全世界只有兩種民族，它們之間正進行標誌着新革命的偉大的階級鬥爭，即一方面是無產階級為了捍衛社會主義而進行的階級鬥爭，另一方面是資產階級為了捍衛資本主義而進行的階級鬥爭。

因為資本主義掌握着整個資產階級世界（資產階級），所以只要資本主義在統治，一切國家必然是階級國家，一切政府必然是階

級政府，它們為統治階級的目的和利益服務，進行擁護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擁護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擁護我們的敵人反對我們和我們的階級鬥爭。從階級鬥爭這個戰鬥的（militant）社會主義的基礎來看，這是真理，關於這一點，常識的邏輯，事實的邏輯都不容許有任何的懷疑。社會主義者要是加入資產階級政府，不是倒向敵人方面，就是使自己屈從於敵人。至少，一個成了資產階級政府成員的社會主義者，就同我們戰鬥的社會主義者分離了。他可以依舊自認為社會主義者，但是他不再是社會主義者了；他可以深信自己的忠誠，但是他不懂得階級鬥爭的實質，不懂得階級鬥爭是社會主義的基礎。

現在在資本主義統治下，無論哪一個富有仁慈思想和最良好意願的政府，都不能為我們的事業做出什麼認真的事情。必須謹防各種幻想（自我欺騙）。還在幾十年前我就說過，如果通向地獄的道路是用善良的願望鋪成的，那末通向失敗的道路就是用幻想鋪成的。在現代社會下，不可能有非資本主義的政府。機遇把他送到這種政府里去的那種倒楣的社會主義者，如果不想背叛自己的階級，就註定是無所作為的。英國資產階級掌握巧妙的手法已經一百年了，為麻痺反對派，資產階級讓反對派參加政府，而在英國歷屆政府的實踐中，已經形成了這樣一種傳統，吸收反對派中幼稚得足以成為別人手中玩物的最急進分子加入政府。這種人成了他的政府“同事”的掩護物，解除了自己朋友的武裝，因為這些朋友不能對他進行打擊，正如在戰鬥中不能射擊敵人放在自己前面的人質一樣。

這就是我對社會主義者加入資產階級政府的問題的答復。

現在來談談第二個問題，即關於團結和聯合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答復取決於黨的原則和利益。我贊成黨的團結，贊成黨的民族的和國際的團結。但是它應當是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者的團

結。同敌人的团結 (Die Einheit mit Gegnern), 同抱有其他目的和利益的人的团結, 就不是社会主义的团結。我們应当爭取团結, 不管它需要什么代价, 什么牺牲。但是, 为了我們能够取得意見一致和团結, 我們应当擺脫一切異己分子和敌对分子。对想在敌国从敌人手中征募新兵来补充自己军队的将军, 該說些什么呢? 难道这不是愚蠢到极点嗎? 把敌人, 把抱有同我們敌对的目的和利益的士兵吸收到我們的军队里来, 吸收到我們的党(它是一支为了进行阶级斗争和阶级战争的军队)里来, 这就是失去理智, 这就是自杀。

站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 我們是不可战胜的, 如果我們离开这个基础, 我們就要毁灭, 因为我們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了。社会主义的力量和威力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 我們进行阶级斗争, 工人阶级受到资本家阶级的剥削和压迫,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不可能有任何比較认真的改革来推翻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

我們不能把我們的原則当做交易品, 我們不能同統治制度进行任何妥协, 訂立任何协定。我們应当推翻統治制度, 同它进行殊死战。它必須被打倒, 社会主义才能取得胜利, 要知道, 我們事实上不能期待統治阶级本身会給自己和自己的統治以最后的一击。因此, “国际工人协会”教导工人說: 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本身的事情。

毫无疑问, 有这样的资产者, 他們从正义感和人道主义出发站在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一边, 但是这只是一种例外, 因为资产阶级群众浸透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識, 浸透了統治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識。此外, 由于资产阶级群众是統治阶级, 它具有的阶级意識甚至比无产阶级要尖銳得多, 强烈得多。

我的話完了。你們詢問我的意見, 我对你們談了。你們应当做党的原則和利益要求你們做的事情。

向厄彼尔奈代表大会致以兄弟般的敬礼。社会主义者的和工

人的法国万岁！国际社会主义万岁！

威·李卜克内西

1899年8月10日于魏玛

对这封信我用不着再补充什么了。从那时起经历的事件已经证明它是正确的。一个社会主义者参加政府，既得不到什么东西，又不能对某种没有他也可以办到或者可以阻碍的事情加以制止。相反地，既然社会民主党准许或者同意社会主义者参加政府，那末它对当时政府的一切违法行为和失职就要负责，因为社会主义者是政府的成员。

的确，为了求得开脱或谅解，有人说什么事情关系到特殊情况——拯救共和国，要不然它有遭到灭亡的危险。但这是经不起一驳的。保持住法兰西共和国的，并不是呆在政府里的（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内）几个人，而是有大部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支持的法国工人，因此，保卫法兰西共和国的，是绝大多数不受僧侣愚弄，不容反动资本家暴力支配的法国人民。法国的军国主义，远不如德意志的军国主义这样有力，这样危险，而且法国军队比起德意志军队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民的军队”。法国军队在数量上也像德意志军队那样庞大，虽则法国的人口要比德国少1500万，因此法国军队在人口中占相当大的比例。

法国实际上达到这种地步，它应当消灭掉它从1870年到1871年战争时模仿来的普鲁士—德意志军事制度，或者用像陆军部长加里腓将军指挥的一支不大的训练有素的近卫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或者把现在的体制改组为所有能拿枪杆子的人都普遍武装起来的民兵制。这样的军队不会造成国家政变。即使部分军官还是非常反动，但士兵群众却同人民联系得非常紧密，不会被人利用来

发动国家政变。

如果事情真如有人告诉我们的那样，当瓦尔德克—卢骚和加里腓内阁成立的时候，事情关系到保卫共和国免受国家政变的话，那末法国无产阶级共和政体的思想对于政府是一个足够的保证，无论如何要比一个社会主义者参加内阁有更多的保证。

这个内阁总理是个非常典型的资产者大富翁，而陆军部长是个最无耻的撒谎家和“小拿破仑”的打手，又是对付公社的最残忍的刽子手之一，这些情况只会更加清楚地指出米勒兰的行动的整个虚伪性。在瓦尔德克—卢骚的位置上的，即使是一个像布里松⁶⁴那样的真正的民主主义资产者，而在加里腓的位置上的是一个没有被血腥玷污过的可敬的士兵，那末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样的做法恐怕同样是不能容许的。这只不过稍微减轻一些对感情的侮辱。

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这是事实。在阶级对立存在和阶级斗争延续的时候，国家必然是阶级的国家，而这样一个国家的政府也同样必然是阶级的政府。一个允许自己参加这样的政府并同意成为这样的政府的成员的社会主义者，即使在内阁的大门外面，还不像一个伊斯兰教徒在进入寺院时脱掉自己的鞋子那样马上扔掉自己的阶级意识，但如果他没有足够的勇气利用第一个合适的冲突和分裂的时机，他也会很快完全失去阶级意识的。

一个社会主义者能够参加非社会主义的政府这类事情，一般是否可能发生，对于这样一个理论问题我并不感到兴趣。只有在某种危害国家的灾难之后，例如世界大战的时候，当阶级国家的政府被推翻，而一开始没有找到必要的成员来马上成立社会主义政府，那末这类事情才可能发生。

但这种可能的情况在法国实际上不曾有过，而且在整个法国，比瓦尔德克—卢骚和加里腓这两位先生更少具有“拯救共和国”才

能的人，恐怕是找不到的了。社会主义的党按其使命来说，过去、现在和将来始终是保卫共和国的唯一救星——不管有没有米歇尔在内。

法国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盖德和拉法格，在一篇反对“内閣的”机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中指出，在人民选出的代表机关中进行活动和参加国家行政机关或政府，这是有区别的。国家政权和政府是阶级的统治机构，它按照自己的性质是要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至于参加代表机关（国会、议会、公社委员会等等）则相反，有人民的最高意志（人民的主权）作为自己的源泉，这种意志虽然受到阶级统治的影响，但它超过后者的势力，并且是能够消灭后者势力的唯一力量。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这样的代表机关里好像几块玄武石，它从地里面开掘出来时，穿过砂石层和板岩层；他们来自人民的内部，是人民的一部分，本身拥有人民主权的权利和力量，而这种人民主权的意义和权利超过国家和社会其他一切力量的权利，并决定着这些权利。他们能够在这里，并不是由于有产者政权的照顾，而是违反了有产者的意志，违反了有产者的力量；是的，他们是官，但他们是可尊敬的官，不是为有产者政权服务，而是为人民服务，人民选举他们，是为了由他们来实现人民主权的意志。正因为如此，把我们在议会和其他代表机关的活动看做同统治阶级政权妥协是根本错误的。的确，我们不得不在那里同我们的敌人一起工作，然而作为独立的力量来实现人民委托的权利。这并不是在共同的观点和目标基础上的合作，这是斗争，是相互竞赛，是力量的鉴定，而立法和管理就是从这些东西的配合、趋向和总和中，按照力的四边形的永恒法则形成的。

因此，如果在这个相互斗争和这些战斗的过程中，出现着并且改变着参加者的集团，产生了短时间的接近或者联合，那末这是很自然的；把这类临时的合伙称做妥协，这就是玩弄字眼。从这些关

系和情况中产生并由这些关系和情况决定的一致行动，在同一方面的工作和努力，这一切就像振动万花筒时花玻璃的相互配合一样，谈不上什么条约、联盟或者妥协。不管这种振动的力量是纯粹的机械力量，还是有内在规律的力量，反正都是一样。这是没有任何义务的接近，是一时的产物，他们一下子产生，一下子又重新分道扬镳。

把复选时的共同行动同选举前的协议（这些协议是在普鲁士议会选举时提出的，并且实际上是在巴伐利亚议会选举时订立的）相比较，同样是不正确的。这些共同行动，只是选举大会战中的一个插曲。这次会战是党所安排的，当时，在初选没有得出结果以后，产生了紧接在第一次大会战之后的辅助性战役——复选代表。因此，如果在复选的那些区，我们不是单独进行活动，而是帮助我们敌人中的某个候选人取得胜利（因为选举他会给我们党带来非常大的好处），那末这只不过是对智力的最起码要求。因此，当时我必须捍卫这个自然的、理所当然的策略，但现在幻想参加普鲁士议会选举的各种先生，却宣称这个策略多半是指叛党的原则的。当某种特别法存在并威胁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在两个资产阶级候选人的复选中不投其中反对特别法的候选人的票，那我们简直是些该挨粗木棍的笨驴。但是要知道，这根本不是妥协！我们不受任何义务拘束，也不牺牲任何原则、任何利益，相反，我们的活动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如果不这样做我们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失。这个策略是这样简单和自然，只是由于莫名其妙的狭隘的书呆子气，只是由于党的领导忽视把这个策略向同志们进行介绍，才可能长期对这个策略有所怀疑；党的领导机关的领导人，受了党员群众的健全本能的提示，在实践中采用了这个策略。这就是说，每次都是根据特别的决议办事的。没有任何勾当，没有什么欺詐——干脆明确，我们就在那两个敌人相互冲突的地方进行攻击，反对敌人，共

中之一要取得議席，我們擊敗兩個中間比較危險的一個。一個斗争的党所應有的階級策略只能是這樣。

在議會選舉的復選時，我們是斗争的党，我們用自己的力量爭取我們在人民代表機關中的地位，并毫無例外地反對所有其他的党，甚至也反對那樣一些党，我們為了自己的利益在復選時把自己的選票和議席還讓給了這些党的黨員。在普魯士議會選舉時，我們靠自己的力量甚至不能取得一個議席；為了獲得一個或者幾個議席，我們需要求助於某個資產階級政党，同它締結交易。我們的党在國會選舉時是德國最有力量的党，在普魯士議會選舉中却是所有政党中最弱的一個党，甚至完全無能為力，因為雖然我們在“最可恥的選舉法的”基礎上利用了選舉權，但是沒有當選的可能性，只有把自己當做一頭聽憑一個資產階級政党支配的投票畜牲，我們才能獲得議席。

但是在巴伐利亞議會選舉時，所處的環境却有某些不同。巴伐利亞的選舉法並不剝奪我們獲得自己議席的可能性，但這絲毫也不是說有利於選舉妥協，相反地，只是說明今年夏天訂立的政治“交易”是處在更倒楣的境遇里。

我不打算現在來談一般提出的反對參加普魯士議會選舉的理由。由於議會和國會選舉時立場不同而造成的士氣渙散、頭腦昏愊、紀律鬆弛和我黨固有的階級斗争性質的喪失（這是最主要的）——這一切已經常被人們（其中包括我自己）確切地指出過，因此我不打算再向讀者嘮嘮了。

只是還有一個意見：

如果資產階級還擁有生命力，它就用不着我們的幫助來取得普魯士議會選舉的勝利。選舉的頭兩個回合是屬於資產階級選舉人的——只要他們自己不顯出完全不中用，誰都不能爭得他們的多數。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么能幫他們忙呢？難道可以幫助

瘋子或是醉漢走路嗎？可以把他扶起來，但是只要一鬆手，他就會像麻袋那樣重新倒下去的。在我們面前只擺着兩種情況，或者資產階級在政治上還富有生命力，那末它不需要誰的幫助；或者它沒有生命力，那末任何幫助對於它都是無濟於事的。難道能同死尸結成同盟嗎？

我在報紙論戰中發表意見時，說實行新的反對社會主義者的法律，比在議會選舉時同普魯士進步黨訂立選舉協議因而模糊階級對立抹去黨的界限帶來的害處要小些，有人對這加以非難。我越考慮這個問題，就越相信自己的話是正確的。如果由於對黨有危險和損失的威脅，我們就允許自己脫離我們黨的基本原則的軌道，那對於我們的黨會有什麼後果呢？正如俗語所說，害怕是對人們出壞主意的人，而對黨來說害怕就意味着死亡。害怕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這在政治上就斷送了德國的資產階級，如果害怕的心理在我們這裡得到共鳴，那末社會民主黨的死日也快到了。我們不應當有太平思想，但也不應當像綿羊那樣膽戰心驚，而且不應當在害怕心理的影響下，採取不符合我們黨的原則、本質和尊嚴的措施。胆怯、畏縮解除不了敵人的武裝，而只會長他的志氣。這決不是說我們應當試圖用腦袋去碰牆壁。我們希望和應當做一個“實事求是的人”。但是這難道也被否定和駁斥過了嗎？我們一向是同伯恩施坦主張相反的“實事求是的人”。我們一向重視現實，不忘記我們的目的，有計劃有目的地去做工作。各個獨立的德意志邦的議會中的稍微有點合理的改革，總是受到社會民主黨人的支持，或者甚至就是他們提出來的。我們只要回想一下社會改革這一項最重要的改革就夠了，政府在實行這個改革時，為了不致陷入空中樓閣的境地，就應當採納我們幾十年以前提出來的提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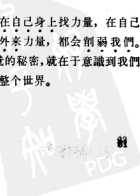
我們甚至能够說，我們是最实际的，也許是唯一实际的政党——明白事理的意义上的实际。只有那些知道发展的內在規律并有計劃地适应这些規律爭取一定目标的人，才是实际的人。我們也正是这样进行工作的。反对我們的那些人，不知道这些規律，或者不承认这些規律，而且想使这些規律服从自己或者把它們消灭掉。那些想强迫水朝山上流的人当然是不实际的，而我們敌人的一切工作就是抱着这种愚蠢的目标。当然有人会對我們說，工人不能单独得到工人階級的解放，他們必須有知識分子和其他階級有知識的人的帮助和协作。我們自己就能指出資產階級政党实行的或者支持的各种有利于工人的措施。但原来这是淺薄的詭辯，因为所有这些社会改革的措施(在这个問題上引证一下俾斯麦的話有重要的意义)，不管它們是多么微不足道，但沒有滿怀階級意識的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倡議和施加压力，是从来实现不了的。

当然，伯恩斯坦认为，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最后終結。这是彻头彻尾地取消階級对立。

我的从前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盟友、現在 in re^① 帝国总理米凱尔，顛倒了这个原理，在他看来，自由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最后終結。而米凱尔的自由主义非常接近于(德意志的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也就是非常接近于中世紀容克的农奴制理想，这是所有长眼睛能看有耳朵能听的人非常清楚的。

不，社会民主党应当獨立存在，就在自己身上找力量，在自己身上汲取力量。任何我們作为依靠的外来力量，都会削弱我們。我們不同凡响的、几乎也是奇迹的成就的秘密，就在于意識到我們的力量和深信社会主义的使命是爭得整个世界。

① 事实上的。



伊斯兰教在他只相信自己、把所有非伊斯兰教徒都看做敌人的时候，他是不可战胜的。但是一到伊斯兰教实行了妥协，踏上了非伊斯兰教的、即所谓文明强国的道路以后，他就丧失了自己的战斗力。对于伊斯兰教来说，不可能有别的出路。他不是解放世界的真正信仰。解放世界的真正信仰是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如果不只相信自己，那末他也不能夺得世界，解放世界。

正因为如此，我们决不抛弃旧的策略！决不抛弃旧的纲领！我们在同科学和经济的发展一道永远前进时，我们现在是以前的我们，我们将来也始终是现在的我们。

否则……社会民主党就会死亡。

蜘蛛和蒼蠅

你們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只圓腹、有毛和身帶粘性的昆蟲，它竭力遠避陽光，躲在陰暗的角落裏編織着它那致人死命的網。可憐、魯莽和輕舉妄動的蒼蠅被網纏住，就會送命。這只丑陋的怪物，長着玻璃球樣的眼睛，向外彎曲的長腳爪，特別適合於捕捉和扼殺受害者。這只怪物就是蜘蛛。

看吧，當獵獲物走近它領地時候，它是多么安靜和沉着地在它的角落裏坐着！看吧，它用多么驚人的靈巧手法，撒開它那致人死命的網，來捕捉和無情地纏住弱小的蒼蠅！這只丑惡的動物時常花費很多時間，熟練地修繕自己的網，好使它的獵獲物無論如何也逃不掉。起初它吐出一根絲，接着兩根、三根，越吐越多。它架設橫絲，还用新的橫絲把它們連結起來，使得在臨死抽搐中跳動的受害者不能把網撕破，甚至不能把網拉壞。

最後，網織好了，圈套布置好了，要逃出這種圈套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時蜘蛛蹲在自己的窠穴裏，等待那由於飢餓而正在覓食的魯莽的蒼蠅走近前來。

它用不着等待多久，蒼蠅很快飛過來了。這只可憐蟲正在尋找食物，四處亂竄，它突然一頭撞到撒開的網上，由於驚吓而被網纏住，它竭力想站穩腳跟，但是沒有成功。

蜘蛛一看到受害者落網，它就从埋伏的地方爬出來，帶着凶惡的眼神，伸出腳爪，慢吞吞地走近獵獲物，它用不着匆忙，因為這只丑陋的家伙非常清楚，一旦倒霉的昆蟲已經落網，就再也逃不出

去了。蜘蛛越走越近，用自己那双嫩出的深绿色的眼睛对受害者打量了一下，而这一眼就使苍蝇神志失常。受折磨的苍蝇吓得更加发抖，它看出它面临的危险，想挣脱缠住它的细丝，力求脱身和得救，结果却在这种绝望和拼命的挣扎中弄得精疲力尽。

但是，一切努力都是白费，一切挣扎都是徒劳！网把它裹得越来越紧，蜘蛛也越走越近。苍蝇被缠在这张精细而妥善设计的网套中，它想摆脱网套而作任何挣扎时，就有新的细丝包围它，新的网套缠住它。结果是喘气，虚脱，再也没有力量进行反抗，只能听凭自己的敌人、自己可怕的胜利者——蜘蛛任意摆布！

于是这只讨厌的怪物，向它伸开了毛茸茸的脚爪，抓住它，撞死它。然后，当它需要和胃口好的时候，就开始从那衰弱的受害者的发抖的身体中吮吸血液，吸了一次又一次。蜘蛛在暂时喝饱了血以后，把受害者留下，并不把它完全杀死。一会儿它又回来重新吸血，只要可怜的苍蝇还没有被彻底消灭，它就要走开又回来，频繁往返，直吸到不留一滴血，不剩一点骨髓。往往经过了很长的时间，而这只可怜的昆虫竟还没有断气。

只要这个贪得无厌的吸血鬼认为受害者的身体或尸骸里还有一点骨髓，它的眼睛就会盯住不放。它榨取受害者的生命，吸取受害者的力量，喝它的血，直到从受害者身上绝对没有什么可捞的时候，才不去纠缠它。

于是，这只僵死、枯槁、缩成一团的可怜的苍蝇，就被抛棄了。一阵疾风吹来把它刮走，这样一切都告结束。

这只吃饱了的躊躇满志的蜘蛛，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它对自己和整个世界感到满意，并且认为，现在有相当多的人毕竟还生活得不错……

这只被人吸尽骨髓和受人杀害的蒼蠅，这只被人榨干血汗、用血液养活和喂飽人家的蒼蠅，就是你們这些城乡的无产者！你們是受人奴役的人民，你們是腦力劳动者，你們是产业工人，你們是战战兢兢的姑娘和軟弱的受人压迫的妇女，不敢要求滿足自己的权利，你們是軍閥的不幸的牺牲者，——总之，你們都是剝削的可怜牺牲品。当你們的血管里再也榨不出什么东西的时候，就被人拋棄。你們是为国家生产全部产品的人，是国家的心臟和智慧，是国家的有生力量。你們只有一种权利，在自己那可怜的角落里由于貧困而服服貼貼地死去，同时你們却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劳动、自己的思維和自己的生命养育了你們的老爷和压迫者——**丑陋的蜘蛛**。

蜘蛛，这是老爷、財主、剝削者、投机商人、資本家、騙子手、高等僧侶和形形色色的寄生虫，这是所有靠压迫我們的暴政得利的人，所有用恶毒法律来鎮压我們的当政魁首，所有把我們变成奴隶的暴君。**蜘蛛**，这是一切靠我們人民过活的人，蹂躪我們的人，蔑視我們痛苦的人，嘲弄我們白費力气、嘲弄我們的劳动的人。

蒼蠅，这是貧苦的工人，他們不得不屈服于雇主隨意規定的一切殘暴命令，因为这些不幸的人沒有錢，他們要賺錢糊口和养活亲人。**蜘蛛**，这是大業主，他們一天要从自己的每个工人身上刮去6个到8个馬克，同时胆敢付給，不，是**恩賜**給工作12到14小时的工人以极低的工資——两三馬克。

蒼蠅，这是矿工，他們为了从地下开采自身注定享受不到的宝藏，在不通風的矿井中卖命。**蜘蛛**，这是老爷、大股东、企业的老板，他們的股票价格虽然漲了一两倍，但他們总是不滿足，因为他们想撈到更多的股息，他們盜竊工人的財物，剝奪工人的劳动所得，一旦工人胆敢要求增加一点工資，就馬上叫軍隊来枪杀“叛乱者”。

蒼蠅，這是從小就被迫在工廠、作坊和父親的屋子裏干重活，幫助雙親賺錢糊口的孩子。蜘蛛，這不是那些由於貧困而不得不犧牲自己孩子的窮爹娘，而是現在那些玷辱人的惡劣條件，這些條件使那些窮爹娘必然違反天良、毀滅自己的家庭。

蒼蠅，這是人民的正直女兒，她盡力以誠實的勞動養自己，但是她对廠主或經理的欲念不作讓步，就找不到工作。這些人利用了她走投無路的處境，然後就會冷酷無情地把她趕走，通常總是“為了避免丑事”把孕婦趕走。蜘蛛，這是年青輕浮的浪蕩子，“好出身”的二流子，他們游手好閑，眉開眼笑地引誘純潔的姑娘，玷污她們，認為自己的使命就是盡量毀壞大批婦女的名聲。

蒼蠅，這是你——勤勞的農民，你為富有的地主耕田，播下並不屬於你收穫的種子，栽培並不屬於你享用的果實。蜘蛛，這是有許多土地的大地主，他們強迫窮苦的佃農、雇工和短工無休無止地勞動，為了使自己可以悠閑、擺闊和穿得漂亮，他們逐年提高地租，降低誠實勞動的工資。

蒼蠅，這是所有我們這些貧窮的普通人，我們向來在祭台的石階上戰戰兢兢，在祭司詛咒前面低頭哈腰，為了僧侶的榮譽和樂趣，我們彼此毆打和奴役；這是所有我們這些卑躬屈膝的人，我們讓我們的壓迫者享受他們暴力和不法行為的果實，因為我們受他們殘害和麻痹意志的宗教信條的影響，精神上十分軟弱。蜘蛛，這是那些身穿黑色袈裟的人，他們有虛偽和貪欲的目光，他們用貶低人的教義欺騙自己的忠實信徒，培養他們唯唯諾諾的精神，這種精神正在毒害靈魂，並且從波蘭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它正在毀滅整個民族。

總之，蒼蠅，這是被壓迫者，被奴役者，被剝削者。蜘蛛，這是卑鄙的市儈和投機分子，這是橫暴和專制，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落到前者的地步。

从前，蜘蛛在城堡和老爷的宫殿里张开自己的网，现在，他们宁愿在巨大的工业生活的中心，在现代骗子的富丽住宅里安身。你多半可以在工业城市里找到他们，但他们也深入农村和小市镇。在剥削猖獗的地区，在工人、一贫如洗的无产者、小手工业者、雇农和担负重税的小农受到暴发户、商人和企业主无穷的食欲洗劫的地方，他们到处滋生繁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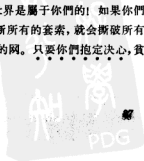
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贫穷的劳动者在敌人的网里白白地挣扎，在斗争中耗尽精力以至死亡。

几世纪以来，在弱小和胆怯的苍蝇反对残酷和血腥的蜘蛛的斗争中，产生了多么骇人听闻的惨剧！那是些血迹斑斑的灾难故事。但是为什么要重提旧事呢？往事已成过去，还是让我们谈谈现在和将来吧。

我们再仔细地看一看现代苍蝇同蜘蛛进行的斗争，就会知道苍蝇所处的条件。我们这些苍蝇来分析一下，我们的敌人对我们重新撒开的网是怎样结成的，我们要尽量识破他们的诡计，但是首先我们要团结起来，因为要撕破缠住我们的网，我们个人的力量是非常单薄的。我们要砸碎捆住我们的锁链，把我们的敌人从他们的住所赶出去，要到处发射教育的明亮光芒，使卑鄙的恶魔不能继续在黑暗中为非作歹！

啊，苍蝇呀苍蝇，只要你们抱定决心！只要你们抱定决心，你们就会不可战胜！蜘蛛确实现在还有力量，但他们人数不多；你们苍蝇确实现在没有作用，也没有影响，但你们人数众多，你们是有生命力的，只要你们抱定决心，整个世界是属于你们的！如果你们团结起来，你们的肩膀一动，就会挣断所有的套索，就会撕破所有缠住你们、使你们在里面挣扎和饿死的网。只要你们抱定决心，贫困和奴役将永远消灭。

就这样学会抱定决心吧！



注 釋

- 1 北德联盟——于1866年普奥战争以后成立的联盟国家。它包括19个德意志邦和三个自由市，总人口为三千万。在联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普鲁士。——第1頁。
- 2 俾斯麦·奥托·封·慎高捷恩公爵(1815—1898)——普鲁士和德国的反动国事活动家，从1862年起是普鲁士政府的首脑，从1871到1890年是德意志帝国的第一任首相。他是通过以普鲁士为领导的反革命途径统一德国的组织者，是工人运动的露骨的敌人和反社会主义者特别法的創議人。——第1頁。
- 3 萊比錫“鑄實叛國家”——是在普法战争以后，由于威·李卜克内西、奥·倍倍尔和阿·赫普納反对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政府策划的对他們的审讯。到1872年3月，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被判監禁两年。——第5頁。
- 4 骯髒馬厩——希腊神話中的傳說的皇帝阿夫吉的馬厩，三十年沒有打扫，而英雄格拉克耳一天就打扫干净了。这是非常骯髒和荒謬的同义語。——第5頁。
- 5 全德工人联合会——在1863年成立的工人的第一个全德政治組織。斐·拉薩尔是联合会的第一任主席，他逝世以后，领导权实际上落到約·施韦澤手里。领导人在許多問題上实行机会主义政策的这个联合会，一直存在到1875年，当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联合会同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納赫派)合并組成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第6頁。
- 6 施韦澤，約翰·巴普提斯特(1833—1875)——德国律師，新聞記者和作家，斐·拉薩尔的最亲近的助手之一，并且是拉薩尔观点的宣傳者；在1867—1871年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席。他奉行同俾斯麦政府妥協的政策。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一政策称为“普鲁士貴族政府社会主

义”。1872年由于暴露了他同普鲁士政权勾结而被开除出联合会。——第6页。

- 7 雅科比，约翰(1805—1877)——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会议左翼的领袖之一；在60年代是左派进步主义者，积极反对俾斯麦。1872年靠近社会民主党，但仍保持自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左翼立场的观点。——第6页。
- 8 “民主周刊”(«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周刊，于1868到1869年在莱比锡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担任编辑，是人民党和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而后是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机关报。——第6页。
- 9 瓦格纳，海尔曼(1815—1889)——德国的反动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是俾斯麦的最亲近的助手之一，是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支持者。——第7页。
- 10 凯特莱尔，威廉·爱麦虞限——男爵，从1850年起是美因区的主教，是“工人问题和基督教”一书和其他有关社会政治问题著作的作者；德国反动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创始人；70年代初是国会议员，中派的积极活动者。——第7页。
- 11 普鲁士立宪冲突——是普鲁士贵族和政府同进步党和部分的自由党党员组成的议会多数议员之间的冲突。在1861年，政府向议会提出改组军队和延长服役期限的草案；议会的多数不同意延长服役期限，并要求监督预算支出，否则拒绝批准预算。政府未经议会同意，就实施军事改组，并继续开支经费。冲突延续了5年多。在普奥战争和北德联盟成立以后，议会多数完全让步，这场冲突才告结束，议会的多数事后批准了政府在整个冲突时期的开支。——第9页。
- 12 进步党——代表大部分德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是学者微耳和同小资产阶级合作社创办人舒尔采—德里奇于1861年创办的。主张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国，主张修订工业法，改组元老院，建立责任内阁和对地方行政机关进行某些改革。在北德联盟成立以前，进步党有很大影响，在普奥战争以后，该党大部分人脱党，成立了民族自由党。——第10页。
- 13 铁血政策——是俾斯麦于1862年在普鲁士议会发表的演说中所阐明的自己统一德国的政策。——第11页。

- 14 拉薩爾，斐迪南(1825—1864)——靠近工人运动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論家和律師；全德工人联合会創始人之一，并是該会的第一任主席，支持普魯士领导下“自上的”統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奠定了机会主义倾向的基础。——第11頁。
- 15 布拉恩，卡尔(1822—1893)——反动的德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1867到1887年是国會議員和普魯士众議院議員，属于大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党。——第12頁。
- 16 封·施韦澤的“大演說”——这是指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施韦澤1869年3月17日在北德联盟議會討論工艺章程草案时的发言。——第13頁。
- 17 三級选举制——从1849年到1918年革命时期，在普魯士实行的議會选举制度。根据这个制度，全体选民按照納稅多寡分为三个等級。把居民的納稅总额分为三等分。然后从納稅最大的納稅人，也就是从最有錢的富人开始，編制全体納稅人的名单。最富的有錢人列入第一等級，小康的有錢人列入第二等級，其余列入第三等級。第一等級人数最少，由富豪組成，第二等級人数較多，第三等級人数最多，但是这三个等級中的每一个等級按同等数量指定已經选了議員的复选人代表。因此选举的命运，几乎完全由非常富裕的那部分居民(也就是有产階級)的投票所决定的。不納稅的人，一般是被剥夺选举权的。——第15頁。
- 18 艾瓦特，亨利(1803—1875)——德国东方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汉諾威独立党(維尔夫党人)的拥护者和在普魯士领导下統一德国的反对者，国會議員。——第16頁。
- 19 基尔歇，马克塞(1832—1905)——德国资产阶级經濟学家，进步黨員，同弗·敦克尔一起是所謂基尔歇—敦克尔职工会的創始人之一，他們宣揚“階級和平”的思想，企图提出在资产阶级监督下进行工会运动，阻碍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間的傳播。——第18頁。
- 20 “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 简称«Norddeutsche»)——德国的日报，从1861到1918年在柏林出版，出版初期实行资产阶级民主路綫，当时威·李卜克内西为该报撰稿。从1862年起，該报落到反动分子手中，在1890年前接受俾斯麦的津貼。——第18頁。
- 21 布拉斯，奥古斯特(1818—1876)——德国政論家，在1848到1849年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北德总汇报”的創始人和第一任編

- 輯(在1871年以前),1862年轉到保守派陣營,并成了俾斯麥的狂熱擁護者。——第18頁。
- 22 拉薩爾的“公開答復”——指拉薩爾的著作“公開答復”(«Offenes Antwortschreiben»),是他在1863年3月1日,答復工人教育聯合會萊比錫委員會請他制定工人階級總任務時寫成的。斐·拉薩爾在這篇著作中建議建立全德工人組織,以通過和平方法爭取普選權。——第18頁。
- 23 米凱爾,約翰(1828—1901)——德國資產階級政治和國事活動家,在1848年革命時期是左翼民主黨人,後來倒向反動陣營,是民族自由黨的領袖之一,屢任國會議員;1890到1901年是普魯士的財政部長。——第19頁。
- 24 順利進行罷工——指1868年春柏林粗木工的罷工,這次罷工以工人獲得勝利告終。——第22頁。
- 25 阿爾姆帕爾斯塔——全德工人聯合會會員。——第23頁。
- 26 “喧鬧”(«Kladderadatsch»)——德國的諷刺週刊,於1848年創刊。在創辦初期嘲諷陳腐的半封建制度,後來落到反動分子手中,開始接受俾斯麥的保護。——第27頁。
- 27 薩多瓦戰役——1866年普奧戰爭的最大一次戰役,這次戰役以奧軍的失敗告終,並決定了有利於普魯士的戰局。——第27頁。
- 28 德意志聯邦——三十九個德意志邦的聯合,於1815年維也納會議簽署成立的。在聯邦中起領導作用的是奧地利。在普奧戰爭時,大部分邦(德意志聯邦的成員)幫助奧地利作戰。——第30頁。
- 29 吉特希納(伊欽)戰役——普魯士軍隊同奧地利盟國(薩克森王子阿爾伯特的軍隊)於1866年在捷克的吉特希納(伊欽)城附近的戰役,這次戰役的結果是奧薩聯軍的失敗和不斷退却。——第30頁。
- 30 薩托里——凡爾賽附近的一個監獄,1871年在那裡殘酷地處死過巴黎公社的參加者。——第31頁。
- 31 古別都斯堡——奧·倍倍爾和威·李卜克內西於1872年萊比錫案件判決後服刑的監獄(見注3)。——第31頁。
- 32 阿凱爾曼,克爾·古斯達夫(1820—1901)——德國反動的政治活動家,在1869到1893年是保守黨選入國會的議員,是限制工業自由和恢復行會限制的熱烈支持者。——第32頁。

- 33 伯恩斯坦, 爱德华(1850—1930)——德国社会民主党员, 修正主义者, 1881到1890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编辑, 弗·恩格斯逝世以后, 在许多文章中, 特别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1902)一书中, 公开发表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后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极端机会主义派的头子。——第33页。
- 34 Isegrim(麦克斯·希佩尔的笔名)(1859—1928)——德国社会民主党员, 露骨的修正主义者。90年代末在发表的许多著作中修正恩格斯有关战争问题的观点, 他证明说, 德国无产阶级似乎同德国军国主义的发展有着利害关系。后来, 当了国会议员时, 公开庇护德国帝国主义的掠夺侵略政策。——第33页。
- 35 “前进报”(«Vorwärts»)——日报, 德国社会民主党自1891到1893年的中央机关报。1891到1900年该报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是正式的马克思主义机关报, 同时也刊载修正主义文章。——第34页。
- 36 米勒兰, 亚历山大(1859—1943)——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90年代接近社会主义者, 1899年参加瓦尔德克—卢骚反动政府, 担任商业部长——这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中社会主义者参加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的第一次事件。后来被开除出社会党, 屡任部长职位, 在20年代是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第35页。
- 37 盖得, 茹尔(1845—1922)——法国社会主义者, 法国工人党和法国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后来在第二国际中是中派的代表。——第35页。
- 38 拉法格, 保尔(1842—1911)——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 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 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挚友和学生, 是许多有关历史、哲学等著作的作者。——第35页。
- 39 瓦扬, 爱德华(1840—1915)——法国社会主义者, 巴黎公社的杰出活动家,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以后是法国社会党的组织者之一, 最后站到改良主义立场上去了。——第35页。
- 40 瓦尔德克—卢骚, 勒奈(1846—1904)——法国的反动国事活动家, 1899到1902年是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理。——第35页。
- 41 加里腓, 加斯东(1830—1909)——法国将军, 是1871年扼杀巴黎公社的刽子手, 1899到1902年是陆军部长。——第35页。
- 42 辛格尔, 保尔(1844—1911)——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杰出活动家, 奥·

- 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的最亲近的战友之一，从1890年起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局主席，1884到1911年是国会议员，积极反对修正主义。——第37页。
- 43 倍倍尔，奥古斯特(1840—1913)——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创始人和最杰出的活动家之一，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朋友，积极同修正主义作斗争，临终前在许多问题上站在中派立场上。——第37页。
- 44 “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周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于反社会主义者特别法实施时期出版，从1879年9月到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从1888年10月到1890年9月在伦敦出版。——第38页。
- 45 卡尼茨，汉斯(1841—1913)——德国保守派政治活动家，大地主，地主党领袖。捍卫粮食上的保护关税，赞成政府对粮食的国外贸易进行垄断，并把这称为“社会主义”措施。——第42页。
- 46 “阿克戎河”——是希腊神话中一条在地狱里的河流，死者的灵魂必定要渡过这条河。——第43页。
- 47 布林尔，洛塔尔(1817—1892)——德国政治活动家；在1848年革命时期是激进主义者，后来亡命伦敦，当新闻记者，在回到德国以后，是俾斯麦的最亲近的工作人员，在1864到1886年是外交部的机密顾问。在1865年得到俾斯麦的同意，企图引诱卡·马克思为政府的报纸“普鲁士国家公报”(«Preussischer Staatsanzeiger»)撰稿。——第43页。
- 48 “国家公报”(«Staatsanzeiger»)从1851到1871年的全名是«Königlicher Preussischer Staatsanzeiger»，是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报纸。——第43页。
- 49 李希特尔，欧根(1838—1906)——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进步党领袖。——第47页。
- 50 拉科维茨——瓦拉赫贵族，于1864年8月决斗中杀害了斐迪南·拉薩尔。——第48页。
- 51 反社会主义者特别法——德意志国会根据俾斯麦倡议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法律；禁止任何从事社会主义宣传的组织 and 报刊。根据这条法律，社会民主党被禁止活动，所有的工人组织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报纸都被查封，在许多城市宣布“小”戒严状态，党的许多著名活动家被捕或被驱逐出境。这条法律到1890年一直生效。——第48页。

- 52 苦役法——社会民主主义报刊这样称呼 1899 年夏季政府提交国会审查的法律草案，根据这个法案，凡是号召罢工以及阻碍工贼上工的人，都要处以坐苦役监狱的罪。经过长久的讨论，国会大多数议员否决了这个草案。——第53页。
- 53 施杜姆，卡尔（“施杜姆国王”）（1836—1901）——德国工业家和保守派政治活动家，萨克森大冶金企业的所有主，是那里最有权势的人物，因此得到了“施杜姆国王”的称号，屡任国会议员；反动的德国帝国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露骨敌人，同时以“社会政策”和建立救济工人的慈善机关的支持者进行活动。——第53页。
- 54 威廉二世的二月法令——是鉴于工人运动日益发展的威廉二世以元首和社会工作部的名义，在1890年2月初颁布的法令，法令佯称必须改善工人的状况，即缩短工作日、允许工人代表参加同雇主和政府机关的谈判等等。这些法令只是为了达到蛊惑人心的目的，但是没有得逞。——第54页。
- 55 王德威尔得，艾米尔（1866—1938）——比利时社会主义者，后来是第二国际的最露骨的机会主义者头子之一。——第56页。
- 56 “维也纳工人报”（«Wiener Arbeiterzeitung»）——日报。从1889年起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第56页。
- 57 反对政党宣传革命的法律（被称做«Umsturzgesetz»）——这是指1894年12月提交国会的政府法案，规定对煽动反对政府、散布旨在反对宗教和教会的观点加以严厉惩罚。大多数国会议员否决了这个法案。——第58页。
- 58 舒尔采—德里奇，海尔曼（1808—1883）——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和合作社创办人，许多论文和小册子的作者，在这些著作中表现为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论证资本家和工人利益的“和谐”。——第60页。
- 59 喀普里维，列奥（1831—1899）——德国的反动的军事国事活动家，1890到1894年是德意志帝国的首相。——第62页。
- 60 鲍勒斯，让（1859—1914）——国际和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改良主义者。在90年代发展了由国家对个别资本垄断的国有化思想。——第64页。
- 61 台尔克，卡尔·威廉（1817—1898）——斐·拉萨尔的追随者之一，

1865 年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席，后来在 1875 年 哥达代表大会上促成了拉薩尔派和爱森納赫派的統一。——第 68 頁。

- 62 舒馬赫，格奧爾格——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機會主義者，在 1898 年由於在國會選舉中支持自由黨人被開除出黨。——第 71 頁。
- 63 法國工黨——法國工人階級的政黨。建立於 1879 到 1880 年，該黨組織者是茹·蓋得和保·拉法格。於 1882 年分裂成為以茹·蓋得為首的馬克思主義擁護者和以邊·馬隆和帕·布魯斯為首的改良主義者（即所謂實行派社會主義者）。——第 72 頁。
- 64 布里松，昂利（1835—1912）——法國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急進主義者。1876 到 1912 年是國會議員，主張政教分立。——第 76 頁。

新學
PDG